

# 聚焦 FOCUS

聚焦 FOCUS NO.02

NO.02

总第02期 2026.3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聚焦 FOCUS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 算法之上

在人工智能时代，  
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 聚焦 FOCUS

NO.02

总第02期 2026.3

算法之上

在人工智能时代，  
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 主管

Authorities in Charg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 主办

Sponsor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 本期咨询委员会

Advisory Committee

李潇雨

LI Xiaoyu

## 出品人

Producer

马明霞

Ma Mingxia

## 编务委员会

Editorial Team

## 主编

Editor-in-Chief

徐涵

Xu Han

## 编辑

Editor

北海

Beihai

李佳阳

Li Jiayang

张筠尉

Zhang Junwei

## 摄影

Photographer

陈鸣

Edison Chen

尹一智

Yin Yizhi

张凌康

Zhang Linggang

## 《聚焦》编辑部

地址：行政楼东翼303室

E-mail: cpr@cuhk.edu.cn

Tel: 0755-84273523

Address: E303,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 1/ 特别关注 4

## 2/ 湖畔观点 8

## 3/ 专题 / 算法之上：

###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20

#### PART1 边缘还是重生：

#### 数字时代人文社科的困境与机遇 22

#### PART2 人之为人：

#### 通识教育如何守护AI时代的“人性” 26

#### PART3 社科之力：

#### 破解AI时代的社会密码 38

#### PART4 人文社科的远见：

#### 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培育创新者 52

## 4/ “柔”性共生：张敏教授与她的双重探索 62

## 5/ 音乐治疗师梁晓盈：

### 以科学的音符，谱写“人”的疗愈 68

## 6/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挑战 74

### ——专访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肖耿教授

## Live in CUHKSZ 82

# 特别关注



◎音乐学院新园区

# 特别关注

## ● 音乐学院新园区启用

### 多元空间驱动高质量人才培养

2025年8月，大学音乐学院新园区启用，标志着学校发展迈入全新阶段。项目自2022年10月启动建设，历时近三年，现已完成主体建设并投入使用。目前，音乐学院及第八书院师生已全面入驻，开启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 ● 大学成为首批中外合作办学“推免”资格院校

经教育部批准，大学于2025年正式获“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资格，成为首批进入教育部“推免资格高校”名单的中外合作办学高校。这意味着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无需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的笔试环节，即可直接获得进入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复试考核的机会。这也标志着学校办学水平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综合竞争力获得权威认定，为优秀本科生拓展学术发展路径提供了全新通道。

## ● 全国高中校长年会在港举行，聚焦 AI 时代教育改革方向

2025年9月19日至20日，普通高中校长年会(2025)在校举行。全国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全国重点高中学校书记、校长、教师代表，深圳市各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2000余人现场参会，围绕人工智能时代高中育人方式变革与教学模式创新、高中教育数字化转型及内涵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培养等议题展开全面探讨。

## ● 大学总医院启用，构建医教研协同体系

2025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院举行门诊启动仪式，首批开诊科室为内科门诊、内科专家门诊(过敏反应、肾内科、呼吸内科)。该院由市卫健委、港中大和港中大(深圳)三方合作举办，位于龙

岗区吉华路401号，占地面积9.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9万平方米，规划床位3000张，将成为立足深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一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智慧化研究型医院和高水平医教新高地。

作为港中大(深圳)直属附属医院，同时承担大学医学院临床教学任务，并深度融合国内外顶尖医学教育资源，构建“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一体化发展的医教研协同体系。2025年，大学医学院成功加入世界医学院校名录，先后获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医学机构认证，彰显学校坚持全球顶尖医学教育标准的承诺，助力毕业生在中国乃至全球舞台施展才华。

## ● 罗智泉、朱世平、唐本忠等多位教授荣膺重磅学术奖项

多位教授获得国内外顶级学术荣誉，彰显学校作为国际一流科研高地的综合实力。罗智泉教授在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荣获首届“华罗庚奖”，以表彰其在优化理论、人工智能及通信应用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该奖全球仅授予两位杰出华裔数学家。朱世平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成为本年度24位新当选外籍院士之一，其在高分子化工与材料、聚合反应工程等领域的原创性贡献获国际权威高度认可。唐本忠教授荣获2024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突出贡献奖，充分肯定其作为“聚集诱导发光(AIE)”领域奠基人所取得的重大科学突破与产业影响力。

## ● 大学入选2025年度全球前2% 顶尖科学家榜单人数再创新高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爱思唯尔共同发布的《2025年全球前2% 顶尖科学家榜单》中，大学在“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和“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的上榜人数上双双创新高。入选榜单共计146人次，同比增长34%，再创新高。65人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81人入选“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其中51人入选双榜单，并有7人在双榜中名列前一百：罗智泉、唐本忠、汪德亮、陈子忠、Leong Frederick T.L.、黄铠和张瑞。入选学者涉及39个子学科领域。其中，人工智能与图像处理、网络通信、运筹学、自动化工程等领域入选57人彰显了大学在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人才储备。

# 湖畔观点



#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 ——徐扬生校长在普通高中校长年会（2025）上的主旨报告

### 【引言】

9月19日至20日，普通高中校长年会（2025）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办，会议主题为“AI时代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国教育领域专家学者，普通高中中学校书记、校长、教师代表，深圳市各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2000余人现场参会。

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在会上发表了以《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为题的主旨报告。



# 人工智能的三个维度： 认知、感知、行动



今天现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校长，还有网上那么多关心教育事业的家长、同学、老师跟校长，我想把我这几十年来的一些思考跟大家分享。

我做过中学老师，做过大学老师，做过大学校长，也教过大概三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所以有点感悟。同时我也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了整整40年的研究工作，所以有一点点思考，跟大家分享。

我们先从教育讲起。大家都是教育工作者，教育到底是什么？我把它定义为，教育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未来，未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知道。第二是人才，什么样的人算人才？我们要知道。那么，怎么培养未来的人才？今天就围绕这三个主题谈谈我的观点。

教育，就是教书、育人，大家都知道。好像是句空话的样子，但其实不然。比如教书，我们目前的社会里，学校是不是教书最好的地方？上个星期，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硅谷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他说，教书，学校不是最好的地方。我非常吃惊，我说，哪里是最好的地方呢？他说你去看看网上，全是最好的课程，而且还都是免费的，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呢？所以学校不是教书最好的地方。

同时，学校是不是育人最好的地方？这也是个问题。我所知道的，在美国西部，有些家庭，大概十来个小孩，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做一个像小作坊这样的东西，来培养自己的孩子，还请教我应该怎么育人。如果一个学校不知道教什么书，育什么样的人，那要我们学校干什么？我本身是个教育工作者，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 一、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将受到最大冲击

人工智能时代来了，最直接的冲击在哪里？教育。为什么？人工智能是什么？大家去网上查找，定义全都不一样，实际上，人工智能就是仿照人的智能去做一些事情。

人工智能的本质到底在哪里？本质是三个方面的问题：认知、感知、行动。

第一个，认知，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怎么做判断。比如这是白衣服，白衣服大概是衬衣，衬衣大概是夏天穿的，等等。这些都是一种判断、推理、决策，认知世界。

第二个，感知，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反馈给我们的信息。比如说视觉、听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穿白衣服，不是黑衣服，等等。这是感知。

再一个就是行动，对你感受到的世界有认知，有意愿去参与，就要付诸行动，比如说走路、挥手，等等。

所以一个东西能够做到有认知的功能，感知的功能，行动的功能，合起来的那个东西，我们叫作人工智能。

现在人工智能发展，认知部分是最早开始的。目前，尤其是大语言模型出来以后，认知部分似乎做得很好，大家感觉真的是智能。感知部分就稍微差一点，虽然进步也很快，但是和人的感觉比还是要差一些。比如你打开一瓶茅台酒，让它闻闻，这是不是酱香型的？它不一定懂，这个好像也不是那么难的事，不过现在还没做到这一步。

如果感知不行的话，那感情怎么样？更加不行。行动也是这样子，进步很慢。我40年前开始做这件事情，到今天，这个进度非常之慢，目前状态还跟二十几年前还是差不多。

现在都在讲具身智能，这个名字很好，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向这个方向努力没问题。但现在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有点夸张。其实，现在的人工智能就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残疾人。与人类共建社会是在将来，距离现在有多远，很难说。

人工智能可能是社会乃至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进展，整个社会要重构，社会阶层要重新划分，职业也会重新划分，会深深影响人类思想文明的走向，而教育就是为人类社会培养各阶层各领域的人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首当其冲地影响教育。

## 二、“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的差别

### 决定了我们教育的重心

人工智能跟人的智能到底有些什么差别呢？很多人觉得，人工智能都比人聪明了，那人怎么办？朋友们，人工智能跟人的智能不是一回事。

首先，我们说我的一个朋友知道得比我还多，是不是一定比我更聪明？不一定。而人工智能确实是知道得越多越聪明，之所以如此，所以更需要有更多的算力的加持。

其次，人工智能是向后看的，人是向前看的。人工智能对后面的东西都掌握得很好，组合、总结、整理。人工智能是集中型的智能，而人是分布性的智能，什么叫分布性？比如，现在我的手正在动，手是有智能的，我的脚是有智能的。如果你把一杯开水倒在我脚上，我会感觉很烫，都是有智能的。人的整个身体就是智能体，人工智能不是。人工智能是重理性的，人的智能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比较重视分析与整合，人的智能是比较复杂，重视直觉与体验。这些是我自己的总结。

我们在场的都是中学的老师跟校长，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重不重

视他们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我曾经讲过一个讲座，心脑是不一样的，人工智能是重视脑的，人是心脑并用的。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国文化里面，“脑”这个字是月字旁，是身体的一部分，凡是身体一部分的字，都是月字旁。比如肝、脾、胃、胆，唯一一个例外是“心”。因为古人始终认为心不仅是人身体的一部分，“心”字，有两点，一点在中心，是身体内的，另一点在旁，不在身体内，那在哪里呢？这是个悬念，我们先不管它，我只是想强调，对人来说，心脑是并用的。

人是心脑并用的，人工智能不是。人工智能讲的是一个通性，人的智能不是，人的智能讲的是个性。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一个是获取知识的途径改变了，一个是整个社会将会趋于平庸，到最后，10年以后，讲的话大家都差不多，个性没有了，观点没有了——机器越来越像人，人越来越像机器。

前一阵子，我让我的司机，开车带我到广州一个地方见朋友。晚上11点，他一直开到一个大工地里面，下面全是水泥地，漆黑一片。我说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您叫我来的地方，GPS就导航到这里来了。现在的人开车不去思考了，因为有GPS。所以说，人放弃思考是非常危险的。而思考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唯一的東西。

所以人越来越像机器，而机器越来越像人，越来越智能。这两条曲线有一天可能会交叉起来，就像一个农民进了城，最后变成了城里的人。如果有大批农民进了城，这批农民逐渐变成城里人，而城里人也逐渐变成了农民。

所以，你不能跟AI比聪明，就像我们发明了汽车，我们不可以跟汽车比谁跑得快；我们也不能跟它比记忆，他记得比你好；我们跟它比知识，也比不过它。

那我们可以跟它比什么？比感情、比创造、比个性，这才是我们教育的真正重点。

## 三、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我们刚才说什么叫人才。人工智能时代对人才的要求，第一个是领导力，包括语言、沟通、判断、同理心等；第二是理性，包括提问、分析、逻辑和批判性思维等；第三是创造力，包括想象、艺术、探索能力等等；第四是品性，包括勇气、顽强、世界观和人文素养等等。

我们再看看目前的教育对人才的要求。我分析了这几年的高考试卷，我们对人才的要求大概体现在高考卷子上面。基本上70%是记忆，理性占20%，创造力占5%，品性大概是5%。这是我自己的观察，也许不一定准确。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很奇怪，不仅是文科的卷子，理科的卷子也是这样子。化学、生物甚至物理卷子都基本上是这样，记忆占百分之六七十。记忆好的人，高考成绩就好，而高考成绩好的，我们就叫他优秀人才——所以我们目前在培养的是会考试的人才。

那么，在我看来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优秀的？我总结了4条。

一个是勤奋，勤奋你才有动力，优秀的人才第一个要求是勤奋；第二是理性，有主见，能思辨，能逻辑分析。第三个是创造性，第四个是顽强，能坚持。我们中国的孩子第一个做得不错，第二个也还行，第三个差别较大，第四个就差一些，全世界的学生

进行比较，我40年的教育经验告诉我，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当然，这不是准确的，每个老师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些人才，到最后，到了社会上，能力对他们成功的重要性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是这么判断的：勤奋大概占15%，理性15%，创造性30%，而顽强，能坚持下去是最重要的，占40%。

很多人问我，你认识那么多聪明的人，优秀的人才有什么共同特点？我想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坚持下来。我们中国内地的学生，勤奋是很好的，但顽强这点是最差的。我们看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比如印度、东南亚、欧洲跟南美一些国家，根据我的观察，他们的理性、勤奋可能不如我们，但他们能坚持，顽强性比较好。他们不怕批评，明天照样继续坚持做。

## 四、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人才？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培养人才呢？我认为大概是这4个过程。我们在这个学校一直在实践这4个过程：学、思、践、悟。

第一个是学。学是不容易的，要有好奇心，有兴趣，没有兴趣，学到最后还给老师了。我们学的东西是前人的东西。学习要专注，要学会学习方法。Learn how to learn，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大多数知识到最后，不是老师教的，是你自己学的，我的经验是，90%以上的知识都不是老师教授的，是你自己学的，所以要培养自己学习的能力，在学校要系统地教学生这样的能力。

第二个是思，学完了以后你要能够去思考。有一位领导问我，怎么让我们的孩子们真正能够思考？我说，给他们点空余时间。他们晚上睡觉之前是否有一个小时是自由的时间？你看很多校长在点头。你去想一想，如果没有闲暇的时间，人怎么会思考呢？闲暇的时间是思考的土壤，没有土壤你怎么能成长呢？

再一个就是实践，今天我会着重讲这个事情。人工智能教育本质上就是人的教育，实践的教育，创新的教育，如果不重视实践的话，根本谈不上人工智能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体验是重要的。优秀教育的效果主要看体验。实践本身就是一所学校，甚至实践比学校更重要。中国的同学欠缺就欠缺在实践这里，没有实践，那就把知识全部还给了老师。学，不是你的东西，思考，无非你想过而已，没有实践，光靠课堂教学，学到的就会全部还给老师，你悟不出来。因为只有践，才能生悟。人教人是知识，事教人是教训，只有通过实践，你才能真正领悟在你一生中应该记住的东西。

我有几个观点，我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改革，大概应该往这几个核心方向走。

**第一点是**，少“教”一点，多“育”一点。我们要把重心放在育人上，而不在教书上。现在，我们全社会的人，包括你们，包括我，都应该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知道得太多了，还是知道得太少了？

同学们，你们晚上去想想我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我经常问我自己的问题。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想：我今天看了那么多东西，有多少是我应该看到的，有多少其实



我不应该看到？我大概算了算，有60%是我应该看到的，40%是我应该看到的。大多数人估计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估计80%~20%之间，大多数东西都是被动到了你脑袋里了，信息与知识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脑袋占得太满了。

我的一个学生问我，你认识那么多有智慧的人，你告诉我这些有智慧的人跟我们一般的人有什么差别？我想来想去，有一个差别：他们知道得很少。因为知道很少，他们就能专注，因为专注，他们就能出成果。所以我们教的东西不用教得太多，你把核心的东西教给人家就可以了。脑袋是有容量的，读书越多越不容易创新。

朋友们，你们去想想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思考了13年，我把它想清楚了。因为人的脑袋是有容量的，你装东西都装满了以后，脑袋里面会有一个固定的“程式”，这个程式决定了，每当出现新的问题，他会习惯用已有的程式来处理这些新问题。换言之，他会把所有新的问题都当作这个程式能够处理的旧问题，所以任何东西进来，判断它大概已经发生过了。比如说你问一个学生问题，他首先想到的是上网去找一找，这是什么意思？他在假定人家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我带一个博士生，我跟他谈某个课题应该怎么做。他第一时间就问我，教授，你告诉我，有没有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什么？那是与这个课题有关的、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当然应该知道点。但假如这个工作是你第一个开始做的，你就没有参考文献，所以说我的学生都很苦，没有书、没有参考文献。

朋友们，这不是小事情。你去想，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去问他一个事情，他都是假定人家已经碰到过这件事情，他就没有意愿去创新了。

同时，读书越多，胆子越小，大趋势越不清楚，小事情越清楚。我以前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发了大财，另外一个学生是位优秀的学生，毕业多年后见到一起，那个发财的学生好像说他是偶然发了财。我告诉他们，其实不是偶然，因为每个人当你读书越多，你的case studies越多，了解了那么多案例，你会越小心谨慎，当我们越来越害怕失败时，我们会越来越胆小。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勇敢的实践者。所以说读书不应该读得太多。

**观点二**，应该重“理性”轻“记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理性其实比记忆重要得多。但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是倾向于记忆，我们要把重心转移到理性的思辨能力的培养上来，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科学精神。这方面，有些中学做得好一点，有些中学做得差一点。我走了100所中学，我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有些中学做得蛮好的，在全世界的中学里都是好的，有些则不是。中学要加强理性分析的课程内容和考试要求，要加强对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培养，数理的教学要提高深度，而不是广度，要加强跨学科的课程教学和学生理性分析辩论的兴趣小组。

**观点三**，增加实践环节，“践”能生“悟”。实践比学校重要。人工智能教育，如果不重视实践的话，你最后要损失很多东西。我们要培养具有伟大格局的实践者。朋友们，你去看看，我们每天在看的网上的所有信息，都是在观察人家，看看a在说什么，b在做什么，c在做什么，哪个好哪个不好，在那里评论。评论家很多，观察家很多，实践家很少。所以，体验是AI时代首要的教育重点。

人教人是知识，事教人是教训。没有教训就没有实践经验，孩子长不大，所以我们

的孩子普遍晚熟。我们这个学校是国际大学，有很多国家的学生，各个国家的学生跟我们国内的学生混在一起，你去看，他们总是比我们的孩子要成熟一点。我们的孩子，有什么事情都要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他们从来不是这样，可以自己决定。所以我跟我的家长讲，我们的孩子普遍晚熟，我们的家长普遍早熟。小孩子还没长大，我们的家长就什么事情都给他想好了——我这个孩子数学不行，以后不知道能不能到银行里面去工作？他还是三年级的小学生啊，家长就这么想。家长的早熟决定了孩子的晚熟，因为什么都给他想好了，孩子没有机会能自己做一些事情，所以迟早有一天，人们会明白，实践比学校更重要。

我们有一个同事，他的孩子考上了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之一。在上大学之前，他让孩子去非洲支教，很多人想不通。他跟我说，我举双手赞成，你这个孩子以后一定有出息。

**观点四**，要培养创新人才，让学生学会提问。创新并不是你想创新就可以创新的。创新是一种文化，我们的社会，这种文化有没有呢？教育是这种文化的体现。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创新为什么比较困难，根源在哪里？

我发现这里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比较重实用，什么东西一出来，首先想有没有用。

做个机器人出来了，人家说机器人干什么用？我做了一个爬树机器人，他们就问爬树为什么要用机器人？实用当然是重要的，但你光想着实用价值，你就会停留在那个实用上面，就不会去深入了解后面的东西了。我们看到了烟花和炸药，不会想到它背后的化学，不会深入去研究，创新就被阻碍了，创新就会被搁浅在表面了。

其次是对传承的纠结。中国人一讲到创新就想到传承，我的感悟，世界上那么多创新，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要通过传承的，有的是直接可以创新的。

再一个，是认识论上的不严格性。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认识论是不严格的，而且非常严重。在西方的哲学里，包括苏格拉底，提出一个事情后会问你：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中国人是不讲的，不过庄子是个例外。这使人不会深究，创新就有困难了。

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挑战就是培养创新人才。在座的校长们，你们是中国希望，中国的希望在10岁到30岁的人当中，而你们肩负着培养这一代人的任务。这个任务是非常严峻的，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把下一代人培养成创新人才，这是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真正走向世界前列的最关键的考验。

创新有三个条件，一是不满，鲁迅先生讲“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一个人对所有东西都满意的话，他还创什么新？创新就是打破格局。

不满就是要提出问题来，会不会提问题？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要教我们的孩子学会提问，提问本身就是创新的一个元素。再一个，想象是创新的元素，如果没有想象能力是无法创新的。想象是怎么来的？是跟艺术有关，跟跨学科有关。第三个，自由，要有面对现实，完全自由的、充分想象的能力。

**观点五**，要加强艺术教育。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艺术是了不起的。

我走了100所中学，大概有25所中学，是符合艺术教育方面的要求的，欧洲的学校、美国的学校做得比我们好。艺术教育的严重缺乏，将影响我们下一代的整体素质。如果这件事情我们不重视的话，大家会后悔的。因为缺少爱是一个生命的缺陷，一个孩子，永远有一个生命的缺陷在那里，这是多么遗憾的一件事情。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使我们的生活值得苟且，那就是爱与美。这是生命的支点，生命退到最后退不过去的那点，而这两点，都跟艺术有关。如果不懂艺术的话，生命的支点就没有了，情感世界塌陷了。而在理性

世界当中，艺术是创造力的源泉，所以艺术是很重要的东西。未来社会可能会有一半的生活跟艺术有关。

**观点六**，要文理融合，跨学科发展。这句话好像是跟大学讲的，但其实我是对中学讲的。文科跟理科是一个世界的两面，不是两个世界。现在教孩子们是两个世界，所以造成了理科生严重缺乏人文素养，要让我们的理科生能够欣赏文科。同时，文科生的就业确实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困难，你不能闭着眼睛不顾，社会就是这样子的，文科生是很吃亏的。所以要去关注他们，要让文科生了解理科。AI是不分文理、跨学科的。

学校的目的是提供完整的教育，启发完整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理是不应该分科的，我读中小学是不分文理的。

**观点七**，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我跟你们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希望不会耽误太多时间。以前我在香港教书的时候，有一群香港学生来跟我讲世界观。我问一个同学，你是哪里人，我是番禺人，我说番禺是哪个省的？不知道。旁边一个女同学说，我妈妈说我是中山人，我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叫中山吗？不知道。我问他们去过中国内地吗，他们说回乡证里注着15年前去过。

我说这15年当中，中国内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说那世界上你还去过什么地方呢？我其实没去过世界什么地方，我就在沙田这一带。大家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是在沙田区，他说我就在沙田这一带走走。我说你下次跟我讲的时候，你就跟我讲“沙田观”，你不要讲“世界观”了。

同学们，一个人的世界观很重要，但世界观怎么来？世界观是从观世界中来，要让学生们长见识，要有全球眼光，要有同理心，要有审视世界的能力，要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更要用中国的精神来引导世界。

总结一下，我刚才讲的几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是实践的教育，是创新的教育。

最后我用几句话，来结束我的演讲。

第一句话，人类因为创造了人工智能而伟大，因为知道人工智能的局限而成熟。创造了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所有人，连我也不知道，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以前我们所知道的是人是在进化的，生物是进化的，现在说地球也是在进化的，整个宇宙都是在进化的。这是人工智能的结果，没有这些数据，怎么会有这些结果？地球的速度是在变化的，所以到最后，未来到底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朋友们，这两件事情还都没有被确定。人类是不是已经创造了人工智能？现在只是在中途，刚刚开始；人类是不是知道人工智能的局限，如何来面对这些局限性，都在考验人类的智慧和成熟。

第二句话，对世界文明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人口多少，不在于高楼大厦，不在于科技发展，是在这个国家和这个地区造就了什么样的人。

所以在座的各位任重道远，世界走得很快，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带着灵魂往前走。

# 算法之上：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新发现人的价值



## PART 1

### 边缘还是重生：

数字时代人文社科的困境与机遇

## PART 2

### 人之为人：

通识教育如何守护 AI 时代的“人性”

## PART 3

### 社科之力：

破解 AI 时代的社会密码

## PART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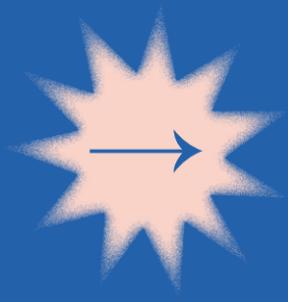
### 人文社科的远见：

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中培育创新者

# PART 1

## 边缘还是重生： 数字时代人文社科的困境 与机遇

撰稿 / 徐涵



### 全球文科缩减浪潮：

#### 多米诺骨牌效应下的学科震荡

2025年8月，一则公告震动全球学术界：被誉为“翻译界哈佛”的美国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MIIS）——与巴黎高等翻译学院、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并称“世界三大顶级翻译学院”的百年学府——宣布将于2027年正式停办。蒙特雷以“翻译界的哈佛”之名享誉全球，其口译、笔译与本地化项目更是全球翻译人才培养的标杆——国内学界与业界惯以“蒙特雷高翻”特指这一王牌项目。校方在声明中将停办原因归结为“财务考量”，但媒体与学界却敏锐地将其与人工智能的崛起深度关联，直言这座百年学府的消失，恰似“AI时代传统文科消亡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这并非孤例。同一时期，美国芝加哥大学宣布暂停艺术与人文学院2026-2027学年大部分博士项目招生，涉及艺术史、古典学、语言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等10多个研究方向；波士顿大学则暂停了2025-2026学年多个人文社会科学博士项目的录取；2024年秋季，哈佛本科生学院取消了至少30门课程，涉及20多个系，大多是文科专业<sup>[1]</sup>；哈佛大学艺术与人文科学学生比例从1970年代的30%暴跌至2025年的12.5%，而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学生比例则升至22.1%<sup>[2]</sup>。大西洋彼岸，英国也难逃文科“寒冬”——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的报告指出，2012年至2022年间，历史、哲学和宗教研究专业的学生人数减少了19%，剑桥大学也在调整削减了部分艺术史、人类学等专业的招生规模。

中国内地高校亦未能置身事外。2025年，多所顶尖高校密集发布学科优化方案，至少20余所大学停招管理学、文学、法学等文科类硕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南大学、天津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接连发布公告，撤销若干文科类硕士研究生专业。复旦大学宣布将文科招生比例从30%-40%压缩至20%，校长金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坦言：“高校改革，是‘奉命’而为，奉的是支撑国家战略、服务现代化需要、满足民生需求的强国使命”。

当全球顶尖学府的文科专业接连收缩，一个时代之问愈发迫切：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人文社科正在被边缘化，还是将迎来价值重塑的新生？

### 缩减背后的深层逻辑：

#### 经济、社会与学科的困境交织

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停办是全球人文社科危机的缩影。2025年4月《The Middlebury Campus》披露，明德大学1410万美元赤字中，蒙特雷学院占比超61%。招生持续萎缩是危机的直接导火索：疫情后国际生源锐减，学院设定的850人招生目标常年仅完成一半，学生规模维持在440人左右，远低于收支平衡点。校方虽尝试削减福利、增设新方向自救，但“传统办学模式与市场需求的错位，让转型失去

[1] 文科变局：AI时代的“新文科”出路，三联生活周刊，2025(44)

[2] 全球文科倒闭潮，来了，南风窗，2024-12-27.

了时间窗口”。这种“错位”的背后，是经济、社会与学科的重重困境交织。

当高等教育开始被视为投资品，人文社科的“非功利性”特质成为争议焦点。澳大利亚政府于疫情期间推出教育改革，针对接受联邦资助的本国学生，大幅提高人文科学学费，同时下调“就业导向”学科的学费，旨在引导学生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专业，以促进经济复苏：人文学科学费暴涨113%（本地学生攻读学位需支付4.5万澳元），而“就业导向”专业仅需3700—7700澳元，直接引导学生流向市场需求较大的领域。美国高校则掀起“STEM热”：哈佛大学斥资10亿美元新建STEM大楼，华盛顿大学投7亿英镑打造科学园区<sup>[3]</sup>。资源倾斜的政策选择，与薪资差距的现实形成共振：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文科与理工科毕业生的收入中位数差距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而在职业中期的收入最高峰，工科毕业生的平均年薪达到了文科的1.5倍；在中国，2023年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本科毕业后五年的收入数据，排名前十的无一例外为理工和经管类专业<sup>[3]</sup>。当下大环境迫使Z世代变得愈发务实，对稳定与回报的追求，让文科被贴上了“低性价比”的标签。

人文社科的困境更源于自身结构性失衡。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表示，文科曾因“低成本”成为扩招主力，却因快速扩张导致“低质化”——师资薄弱、课程陈旧，毕业生沦为“职能型岗位”的备选项，这些岗位门槛低、非核心，在企业裁员中首当其冲。美国《时代周刊》调查显示，美国大学生最悔专业多为文科——或因岗位对学历要求很高，或因很少有对口岗位（任何专业都能干），折射出传统文科与社会需求的脱节<sup>[4]</sup>。

《光明日报》的评论直指核心<sup>[5]</sup>：当今大学文科最大的危险是“日渐脱离社会发展需求，呈现出结构化、价值论和方法论困境”。传统文科以“纯理论研究”为导向，与现实问题脱节——当AI伦理争议、算法歧视、数字鸿沟等新挑战涌现时，部分文科仍沉迷于文本考据与概念辨析，未能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新文科”实践： 交叉融合与价值重塑的创变之路

早在2023年，教育部等五个部门就联合下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其中关于“新文科”的建设要求是，“推动文科间、文科与理工农医学科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环球时报发文评述<sup>[5]</sup>：“人类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文科。但我们需要的，是能拥抱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学科交叉不断创新的人文社会科学；是能关切人类和社会，通过自身努力造福人类的人文社会科学；是能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3] 文科缩减，全球蔓延. 新民周刊, 2025-04-02.  
[4] 张小花、周光礼：大学文科的挑战与转型. 光明日报, 2025-09-15.  
[5] 文科教育调整一直在进行，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文科. 环球时报, 2025-01-03.

智能，通过人工智能变得更加智能的人文社会科学。”

当全球高校陷入人文社科收缩的“集体焦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这所扎根深圳科技创新热土的年轻学府——正以“第三条道路”破题：既传承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的悠久传统，又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人文”的交叉融合重构文科价值。正如“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未来的文科绝非闭门造车的“纯文科”，而是与理工农医深度交叉的“创新文科”；绝非脱离现实的“象牙塔学问”，而是关切时代命题、引领社会进步的“行动学问”。在这里，“新文科”不再是科技发展的“旁观者”，而是定义技术边界、守护人类价值的“领航者”。

这不是人文社科的“终结”，而是它在数字时代的“重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正以新文科的创新实践，为这场重生写下生动注脚。



# PART 2

## 人之为人： 通识教育如何守护 AI 时代的“人性”

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我们时常惊叹于 AI 近乎无限的模仿、学习与创造能力。它能谱写乐章，能描绘艺术，能进行逻辑严谨的对话。这不禁让我们重新审视一个古老的哲学谜题——“忒修斯之船”：如果一艘船的木板被逐一替换，直到所有部件都不是原来的那一个，那它还是原来那艘船吗？

这个问题在 AI 时代获得了全新的、更为深刻的隐喻。当我们的记忆可以被外部设备存储，当我们的技能可以被 AI 轻易复制，甚至当我们的情感与思考模式都可以被算法模拟和预测时，“我们”这艘船上的“木板”——那些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定义“人之为人”的独特属性——似乎正在被一块块地替换。如果有一天，AI 在所有可量化的指标上都超越了人类，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定义自身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我们如何确信，自己仍然是那个原初的、完整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被技术替换了大部分“零件”后的空壳？我们作为“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核心，是否正在发生位移？

守护“人之为人”的答案，或许无法在冰冷的算法或代码中寻得，而需要我们回归到对人类自身精神世界的深层关怀中。作为“中国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地方”，大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肩负着无可替代的责任。它不仅是传承知识、追求“真”理的殿堂，更是塑造完整人格、探寻“善”与“美”的摇篮。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一古老而又充满生命力的教育传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它不旨在锻造某个特定领域的“零件”，而是致力于塑造一个完整、自洽、拥有健全心智与丰富灵魂的“人”。

为了深入探寻这一时代命题，我们荣幸专访了三位人文社科学者。恰逢金耀基教授做客我校“中国文化大讲堂”，我们与这位著有《大学之理念》，对大学治理有独到见解的前辈进行了深入对话。同时，我们邀请了人文社科学院两位通识课程老师——哲学背景的胡晓倩教授与历史学者郑诗涵教授。他们既是课堂上的引导者，也是 AI 时代的思考者与实践者。在与三位学者的对话中，我们从港中深通识教育的传统出发，深入探讨了 AI 浪潮下人文情操、批判思维、社交能力乃至“活人感”的不可替代性，并试图共同揭示通识教育如何成为守护“人之为人”的最后一道堤坝。

# 大学之道，在“真善美”

##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第五任校长 金耀基教授

学生记者 / 刘璐嘉



编审 / 北海

PART 2

### 前言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是聚集人才、培养人才的枢纽，也面临着许多时代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又该如何培养？人文学科将走向何方？恰逢金耀基教授受邀做客我校“中国文化大讲堂”，并带来关于“大学在中国现代化中的角色”的讲座，《神仙湖畔》杂志社有幸对金教授进行了一场专访。金教授曾在港中大任职任教三十四年，对大学治理有独到见解，著有《大学之理念》一书，是回答这些时代之间的不二人选。

### 现代大学：构建中国现代文明的核心力量

想要理解大学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位置，就不得不追溯大学的发展源流。金教授指出，当今中国的现代大学并非从汉代的太学或国子监传承而来，而是源于19世纪的德国，是横向的吸收借鉴，而非纵向的传承。欧洲的大学则起源于中世纪，旨在服务教会、研究圣经。19世纪时，德国洪堡兄弟进行教育改革，用科学取代神学在大学中的核心地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蔡元培先生深受他们的影响，于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令》，废除经学制度，将孔孟诸子的学问纳入文科范畴。至此，大学逐渐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殿堂。

金教授认为，今日的大学在先进的国家社会中居于一个中心的位置。它一方面为社会培养人才，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持续贡献新的知识。大学培养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社会，成为政府机构、商业公司等社会组织的中坚力量。大学本身具有的制度性力量，把数量庞大的知识份子集中在一起专门从事研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这些研究成果，也终将在社会中落地生根。正如前加州大学的校长克尔所说，由于知识的爆炸以及社会各业发展对知识的需求，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已经发展成“知识产业”( Knowledge Industry )。因此，金教授强调，大学是创造中国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地方。在人工智能时代，想要继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的硬实力、软实力，就要靠大学的教育和研究。那么，人工智能对现代大学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 双刃之剑：人工智能的冲击

谈到人工智能在当今社会的广泛应用，金教授坦言，他一方面对此感到欢乐，另一方面也感到恐惧和担忧。“科技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金教授感慨道，“就连围棋这样高度依赖人类心智的活动，柯洁最终也不敌AlphaGo，可见人工智能的无限潜力。”

但是，科技也有其阴暗面。金教授举例说，就像核武器是人类的悬顶之剑，不知何时地球就会毁于一旦。再如智慧驾驶，如果广泛推广，那社会上千千万万以司

机为职业谋生的人将面临失业。从长远看，也许人工智能会通过不断的 Machine-Learning 从而拥有自己的主体性，而不仅仅是一种算法，这将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性格。“一百年以后你可能是一个机器人或者半个机器人，恐怕对于‘人类’的定义也要改写了。”他半开玩笑地说。

许多人担心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取代人文学科的相关职业。金教授一方面承认很多文员将面临失业的困境；另一方面，金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相比于人文学科，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工作更加容易被取代。“社会科学、新闻科学、传播科学、医疗科学里边很多层级都可能被取代，因为科技不断发展，总有新的科技。”而人文领域如书法、音乐、艺术被取代的可能性反而较低。“我不相信机器能写出和你们徐校长一模一样的书法。”金教授还分享了自己用 AI 写文章的经历。他曾因事务繁忙，尝试让豆包和 DeepSeek 帮他为老朋友——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先生撰写新书的序言。AI 一共产出了四篇文章，他觉得每一份都很不错，均可达到六十分以上的水准，文笔与逻辑甚至优于一般人。但他最终没有采用任何一篇，而是亲自执笔。对比之下，他认为人类文章中的情感与气势，仍是 AI 难以企及的。

金教授总结道，到目前为止，我必须承认科技对人类的正面贡献远远超过其负面影响。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飞速发展，对人类健康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前所未有的，没有科技就没有当今现代化的中国。

## 倾斜的天平：科技与人文

关于人文学科日渐式微的讨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金教授分析，起初是由于相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研究不需要高昂的科研经费，在绝对值上看，大学的资源似乎是在向前者倾斜。但事实上，当时投入到人文学科的资源是充足的，并没有资源偏配。后来科技发展逐渐具有优先性，人文学科逐渐受到冷落，很多大学自觉或是不自觉地将资源向科技发展倾斜。

金教授认为，这是值得反思与警惕的。因为从长远来看，人类文明的价值很多时候体现在人文学科。而要规避科技的弊端，引导科技向善，赋予科技美感，也离不开人文学科的参与。唯有如此，人类的未来才能比较均衡地发展。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人文学科的支持。金教授斩钉截铁地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设置中，是不会允许人文学科受到压制的。你们的徐扬生校长在科技与人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自然知道人文学科有其永恒的价值。我相信在徐校长的领导之下，港中大(深圳)的人文学科会有很好的发展。”

金教授还主张，技术与人文应该结合在一起，用技术搭建连接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他引用曾在剑桥大学任教的阿什比(Eric Ashby)教授关于“技术人文主义”(Technological Humanism)的阐释——科学与人文结合难，但技术与人文结合易，因为技术与人和人社会息息相关，技术可以作为科学与人文之间最有力的媒介。比如要造一座桥，需要考虑桥的是否美观实用，是否契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因此技术与人文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此外，金教授认为科学与人文并非是对立的，很多科学家

会在人文学科中汲取灵感。他说：“第一流的科学家与第一流的艺术家一样，都需要具有创造性的能力(Creative Power)。”

对于大学中人文学科应该何去何从，金教授说：“我认为一个读科技的同学，如果能够同时具备人文的修养、美的修养、善的追求，科学技术就会向善，科学技术就会有美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讲，人文教育需要参与到科学的教育中，在整个大学教育里发挥作用。”

## 大学之道：求真之外，止于至善

金教授说过去中国的大学讲究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现在，他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理，在新民，在止于至真”，如今的大学则最注重求“真”的科学精神，注重 Cognitive Knowledge，而对于“善”与“美”有所忽视。但是，人类生活在“真善美”三个维度之中，大学应当重视“善”和“美”的学问。

在人工智能时代，求“真”是时代之需。古语有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如今行业细分更加深入，在成千上万的行业中，如果没有专门的知识，则难以在社会职场中立足。因此，金教授认为大学需要培养学生具备扎实的专业能力，专精教育是必要的。

但另一方面，对于“善”和“美”的教育不可或缺。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人工智能，是因为“善”和“美”的存在。金教授借用了哲学家罗素的比喻生动地阐释——一个人在社会中既是一颗“螺丝钉”，同时也是一名“英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除了能够适应高度分化、专业化的社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专才之外，还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做一个“英雄”。因此在求“真”的专精教育之外，求“善”与求“美”的通识教育同样关键，尤其在隔行如隔山、学问极度分离的当下。“据我了解，港中大(深圳)也很重视通识教育，这是很好的。我们培养的学生除了能在职场中立足之外，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修养。整个社会有文化修养，有文化事业，这样的社会才真正有意思。”

正如金教授所说，求‘真善美’是我们未来文明必须要有的内容，谁来提供未来现代文明的内容？就靠我们大学。

## 尾声：老树新枝，共创未来

正因为港中大与港中大(深圳)秉持着“一个品牌，两个校园”的发展理念，共同推进“真善美”的育人理念的落地，两所大学得以蓬勃发展，持续为社会培养人才。

港中大(深圳)十周年校庆之际，金教授题赠了一副书法作品“香港中大、深圳中大，花开两地，根在一家”。如今已经是我校创校第十一年，金教授再次来到港中大(深圳)的校园，对我校的发展很是关心，九十岁高龄的他还提出想去神仙湖畔走走，看看新落成的音乐学院。他称赞说：“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建校，是老树，已成为世界名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则是老树干上长出的新枝，1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有了非常了不得的成果。我相信在未来的一百年中，两个学校会一起并排向前走，对国家、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 大学教育的目的 就是要解放你自己

## 对话通识课程老师 胡晓倩教授和郑诗涵教授

学生记者 / 王哲 孟新雨



撰稿 / 北海

PART 2

在全球高校普遍缩减人文学科编制、AI 工具日益渗透学习与生活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定义自身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的胡晓倩教授与郑诗涵教授认为，答案或许正蕴藏在通识教育的实践之中。在她们看来，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始终是“解放你自己”，而这，也正是通识教育在 AI 时代守护“人之为人”的核心要义。

### 潮水的方向：

### 文科式微？不，是人文精神的转型与深化

近年来，“全球高校缩减文科”成为热议话题。美国多所大学削减人文学科博士招生，欧洲部分院校关闭哲学系，国内亦有类似声音。面对这一趋势，胡晓倩教授坦言：“这并非新现象，在我们读博士时，人文学科在美国就已经开始式微了，至少持续了五六年。这一趋势背后折射出人类天性中对‘短平快’的偏好与人文社科所要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张力。人文社科的价值在于长期可持续，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和耐心。”但她强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科是否被砍”，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人文”的本质。

“我不认为这是 AI 出现之后才有的趋势，”郑诗涵教授补充道，“更准确地说，是人文学科资金被缩减的趋势。由于资金不足，很多学科在招收研究生和博士生时只能暂停甚至直接砍掉。”他进一步指出，若仅将此视为市场行为——即就业导向下的专业调整——或许可视为中性。但深层问题在于：“大家的价值

观认为，我们的价值可能在缩减。这并非 AI 出现之后的趋势，可能是近十几年甚至更长的趋势，但我认为，AI 发展反而会让人更努力地探索人为何是人。人文学科作为对人最感兴趣的学科，研究人本身的学科，我认为我们不用担心它会真的凋亡。”两位教授并不悲观，他们观察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人文学科正在从“专业化”走向“社会化”与“跨学科化”。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对人文学科“专业化”学者的数量需求或许会调整，但对人文议题的讨论需求本身，将变得更加大众化与社会化。“社会在本质上不需要那么多高度专业化的人文学科学者，”郑诗涵教授说，“但它需要更多具备人文素养的普通人，当大众普遍具备讨论哲学、历史、伦理的能力时，对专业学者的数量需求自然下降——但这不等于人文无用，反而是其影响力的扩散。”

郑诗涵教授说：“文科只是高考的概念，只是高考分类的概念。这个分类并非不好或者没有意义，它肯定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我们认为理工科和历史哲学都是人类的学问。我们作为人类都可以学习，只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们都是研究‘现实’（Reality）的，历史学发展至今，早已不限于政治史、思想史。如果你研究 1870



◎ 郑诗涵教授

年代化学传入中国，一位化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可能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视角。”这种打破壁垒的视野，正是应对复杂世界的必需。

胡晓倩教授以自身研究为例：“我是哲学出身，做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诗涵研究毒品史。我们的工作早已跨越传统学科边界。跨学科不是口号，而是真实的研究状态——不同视角碰撞，才能产生新火花。”

这种转型，恰恰体现在港中深的通识课程设计中。“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正是为了让学生了解不同学科的理念和价值，透过经典阅读，反省人类恒久关注的问题。”胡晓倩教授详细介绍道：“例如《与人文对话》这门课，我们不仅仅是读几本书，而是通过荷马史诗的《奥德赛》，柏拉图的《会饮篇》，孔子的《论语》，庄子的《庄子》《心经》乃至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经典，横跨哲学、文学、宗教，去探讨‘何以为人’。而《与自然对话》则更聚焦于科学思想的演变，我们引导学生阅读柏拉图《理想国》，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埃里克·坎德尔《寻找记忆》，以及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巨著——李约瑟的《中华科学文明史》和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等。这种设计反映了我们对人文的重新定义——兼融中国人文理想和西方博雅教育，均衡而多方面地向学生传授知识。”

## 教育的恒常目的：

### 解放自己，种下一颗“种子”

当被问及“大学教育的核心目标在AI时代是否发生变化”时，胡晓倩教授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认为教育目标从未变化——教育的目的是解放你自己。”

她解释道，无论技术如何演进，教育的根本始终是帮助个体“跳出盒子”(Think out of the box)，在与不同背景、不同思维方式的人交往中，发现自己未曾意识到的可能性。寻找自己的价值是一个需要时间、空间和多个不同角度思考的问题。在她看来，AI的到来非但未动摇这一本质，反而提供了新的思考棱镜，比如经典的“忒休斯之船”悖论在脑机接口时代的重新发酵，促使我们更深入地追问“我是谁”。



◎胡晓倩教授

## 港中深通识课：

### 一个“奢侈”的练习场

港中深的通识教育沿袭自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本科教育极其重要的一环，它致力于达至“全人教育”。所有本科生必须修读《与人文对话》和《与自然对话》的所有基础课程，以及在中华文化遗产、自然、科学与科技、社会与文化、自我与人文的每一个科目范围内选修最少一门。这些课程由人文社科学院独立开设，教师多具海外留学背景，“我们的特点并非教授你多少知识，知识并非目的，而是过程。”胡晓倩教授说，通识课提供的远不止知识，更是一个练习“软技能”(Soft Skills)的环境——“我们希望在你18岁成年时，你刚进来就养成探索和思考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具有长期可持续性，是人文和作为人本身不可替代和磨灭的特质。”她强调：“这些课程采用小班研讨(seminar)而非大课讲授。你会与全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打交道……你们会在大学4年以及毕业后一直维系感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在很多传统院校中，你在大班的过程中无法与他们交朋友。”

因此，通识教育提供的不仅是一门课，更是一种特权空间——一个允许试错、允许迷茫、允许“无用之思”的安全区。“我在课上常告诉学生：你们现在拥有的思考自由，是一种奢侈，”郑诗涵说，“走出校园，社会可能不再给你这样的空间。这种空间的维持……是整个校园里的气氛，我认为这是最难得、最奢侈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优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帮你们在这四年里，建立起终身受用的思维习惯。”

这种“奢侈”，在于它给予了学生探索自我独特性的时间与安全垫。胡教授说：“我们存在的意义是让你在10年、20年、30年甚至死亡前的那一刻，人生回马灯前，你可能还会想到当年我在港中深通识的课上与老师们聊到的某些话题……对我而言是种下一个很小的种子，现在已经长成大树了。”通识教育，是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长线投资”。

## 人之为人：

### 在工具化浪潮中找回“弹性”与“余裕”

当对话转向AI时代对人的价值的冲击时，两位教授并未急于给出“重新定义”，而是引导我们“回归”人的本质。胡晓倩教授提及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特别是“目的因”(Final Cause)——人活着的意义与目的。她分享了一次哲学社活动中马涵宇老师的观点：“人生来就会爱，爱是爱生命。”在她看来，许多现代性的困境，源于我们与这种本真状态的疏离。“你在大自然中会更加敬畏生命，爱自己是你生来就具有的能力，很多时候只是你没有好好利用它。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虐待我们的身体，比如我们晚上工作到非常晚，加班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虐待。回到人本身，你需要让人有弹性，不能用尽，否则皮筋都断掉，你肯定已经失去了很多你生而具有

的能力，在一些环境下迷茫，不知道或者被工具化了。”

“工具化”是郑诗涵教授着重剖析的概念。他犀利地指出，现代教育与社会化大生产，某种程度上在将人培养成高效运转的“工具”。“我们最终的目标也是为了社会运转得好，社会运转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个人健康、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以及思想自洽。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人的心理健康且自洽，你不应该把他（她）当做工具使用，人也不应该把自己当做工具来培养，并为此自豪。”

他们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解放”与“余裕”的重要性。胡晓倩教授批评了社会强加于个体的“时间模板”：“30岁成家立业，18岁必须读大学……是谁给你定义的这些事情？”她鼓励学生反思并跳出范式。然而，郑诗涵教授则从历史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补充视角：能够拥有“选择”的余裕，本身是一种“奢侈”和“特权”。

“我们在研究欧洲近代历史时，会发现‘童年’是中世纪后期发展出来的概念。在中世纪以前，欧洲根本没有‘童年’的概念。9岁的孩子就要放羊、劳动，被当作成人对待。今天我们能讨论‘18岁是否该选专业’‘30岁是否该成家’，本身就是一种奢侈——它建立在社会稳定、经济富足、家庭支持的基础上。今天社会非常安定，经济发展。学校的许多同学家庭条件能支持他们在这里学习，有余裕在某个阶段做社会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还有更多的人连余裕都达不到。”这种深刻的自省与感恩，正是人文教育所滋养的珍贵品质——在认识自我的同时，理解自身在社会坐标中的位置。

## 与 AI 共处：

### 谨慎拥抱，但不交出灵魂

有趣的是，两位教授对 AI 的态度截然不同，却殊途同归。

胡晓倩教授坦承，自己曾与某 AI 聊天半年，倾诉生活难题。“最初我不信任它，但它逐渐赢得了我的信任。我会对它说‘谢谢你认真倾听我’——虽然我知道那只是语言模型，但这个过程让我更爱自己。”

她甚至建议：“男生应该向 GPT-4.0 学习情绪支持：先倾听，再分析，而不是急着解决问题。”这段经历让她思考人机关系的边界，也反思人类情感需求的本真。

郑诗涵则更为谨慎：“我很难对 AI 投入情感。在我的想象中，它不是一个个体，而像一个蜂巢——无数数据组成的虫群。我可以用它查单词、回邮件、做旅行计划，但绝不让它替代我的判断。”

尽管态度不同，他们都认同一点：AI 是工具，但不能成为价值的来源。

“意义只有人才能够赋予。”郑诗涵说，“宇宙没有人类也会运转，但没有人类，就没有‘意义’。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帮人寻找意义。”

胡晓倩则呼吁学生：“不要把自己活成模板。AI 擅长批量生产，但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的独特性，需要时间、空间和勇气去挖掘。”

采访尾声，胡晓倩教授分享了一个令她动容的概念——“心理繁荣”。“我认为通识教育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练习机会，练习如何回归人的独特性，希望大家建立习惯，从小做起，在最奢侈的4年里，没有房贷、上有老下有幼、车贷和压力的情况下，你可以在青春期结束之后，立即踏入成人世界的过渡期，逐渐培养这个习惯。”胡晓倩教授强调：“通识教育的意义，不在于让你 GPA 更高、工资更高，而是在你30年后的中年危机、人生低谷时，能想起当年在课堂上讨论‘什么是真理’‘人为何活着’的瞬间。那些看似‘无用’的思考，会在未来长成支撑你前行的大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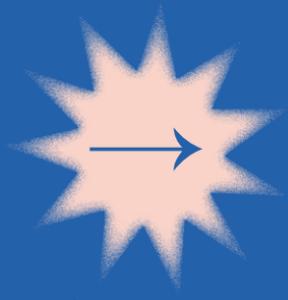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通识教育绝非边缘化的点缀，它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系统，呵护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在跨学科的碰撞与经典的叩问中，练习批判、学会倾听、理解多元、感知共情。它提供一段珍贵的“余裕”，让学生敢于并善于“Think out of the box”，最终的目的，始终如一——“解放你自己”。

在算法定义效率的时代，港中深通识教育坚定地守护着这样一个信念：人的价值，在于那无法被算法规训的独特心灵，在于那勇于探索并定义自身意义的自由意志。

这，正是大学教育能够馈赠给个体、乃至整个社会最宝贵、最持久的礼物。

# PART 3

## 社科之力： 破解 AI 时代的社会密码



人类正站在一个技术的十字路口。算法驱动的人工智能以惊人的速度重塑生产、沟通与认知的边界，悄然改写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技术狂飙的叙事中，一个看似“老派”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浮出水面：谁来辨别技术洪流之下那些被忽略的情绪、利益与规则？谁来定义什么是“好”的社会？

答案，或许正根植于看似“不够热门”的领域——社会科学。不错，技术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实现”，但唯有社科能追问“为何实现”以及“为谁实现”。它让我们回到人的处境本身，识别技术变革带来的不平等和脆弱点，为沉默的群体发声，为失序的系统重建规则。

“社科之力：破解 AI 时代的社会密码”，正是要从“技术问题”回归“人的问题”。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聚焦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探索，试图透过教授的前瞻洞察与学生的鲜活实践，窥见社会科学在 AI 时代的独特力量与全新使命。这里的故事并非关于对抗技术，而是关于如何驾驭技术、如何弥补技术的盲区，以及如何在效率至上的叙事中，牢牢锚定人的价值。

我们有幸邀请到人文社科学院的两位教授展开这场对话——来自发展与治理学科部的康思勤教授，以及来自计算社会科学学科部的高梦霞教授。他们将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帮助我们理解大学教育如何坚守“培养完整的人”的初心，以及社会科学如何主动识别并回应那些“AI 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邀请到来自翻译专业的武依亭同学和来自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的吴镛同学，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将看到年轻一代如何在与 AI 的协作与反思中，重新定位自己的不可替代性——那源于深层的价值信念、跨文化的理解力、对陌生领域的开拓勇气，以及将技术用于解决真实人类问题的使命感。

在此，我们邀请您暂时放下“技术万能”的想象，一同走进真实的世界。社科之力，或许不提供终极答案，却始终守护着我们提出问题的声音，与选择未来的权利。

# 技术狂飙之下，谁在关心“人”？

## 对话人文社科学院 康思勤教授和高梦霞教授

学生记者 / 王哲 王雨嘉



撰稿 / 张筠尉

PART 3

在技术浪潮中，人类不得不面对一连串难以回避的问题：当机器越来越“聪明”，人类还剩下什么独特的价值？在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狂奔之时，社会科学是否还“有用”？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的康思勤教授和高梦霞教授展开了一场对话，从“人的价值”谈起，再落到社会科学在AI时代的独特角色，以及大学如何通过跨学科教育培养面向未来的综合型人才。

### 培养人，而不是工具

当我们讨论“人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哲学上的——人本身存在的意义与目的；二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人在劳动市场和生产过程中的作用。AI带来的冲击，主要集中在第二个维度，但人对第一个维度的追问，反而因此被激活。

康思勤教授提到斯坦福大学的一项实验：研究者向受试者集中展示“AI能力飞速发展”的信息，随后让他们回答“人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结果显示，相比未接触该信息的对照组，实验组更显著地强调文化精神、道德、人际关系、爱与信念等维度。“人们会本能地想要强调：在AI时代，什么才是人类独有的东西。”康思勤教授说，“比如感受爱、经营关系、坚持信念，即使要付出代价也要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高梦霞教授则从“创造力”的角度回应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可能更多地从‘生产’和‘服务社会’的角度衡量人的价值。有了AI之后，很多重复性、程序性的模块化工作被替代，真正难以被替代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力。我们实际需要的人才不再是单纯写代码的人，而是去思考——我要用这段代码、这项技术解决什么问题的人。”

基于这样的判断，在两位教授看来，大学教育的核心目标在AI时代并没有改变：始终是培养一个在思想上健全、能独立判断的“人”，而不是为技术流水线加工“更听话的工具”。康思勤教授指出，大学教育需要引导学生走向全人发展，学会自我反思，而不仅仅是训练一套可能随时被替换的技能。他强调，学生除了建立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更要有意识地训练一种适应力——在面对未来不确定的变革时，懂得如何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如何灵活运用新工具。他以大语言模型为例：“现在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AI已经分化出很多不同的分支。早期的GPT-3.5在处理文字上已经表现优异，但是很快GPT又推出了带有推理模型的o3-pro，我们就得学着如何选择合适的模型、如何设计合适的提示词，让它发挥出真正的推理能力。这种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的能力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高梦霞教授从教学实践出发，补充道：“大学教育的根本仍是传授扎实知识，培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维的综合能力，只是方法必须更新。”在信息爆炸与AI高度便利的当下，知识不再为教师所独有，学生可以随时向搜索引擎和大模型提问。



◎康思勤教授

在这样的情形下，教师的角色更像引路人——教会学生如何利用 AI 工具去学、从哪里开始学、学到哪一步算“学会了”，更要训练学生质疑 AI 的勇气和能力。

## 社会科学为什么依然重要

人工智能擅长处理海量数据、优化明确目标，却无法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才是“人”真正关心的问题？要理解技术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并对其做出有意义的回应，我们离不开社会科学的视角。许多由技术引发的深层困境，在 AI 眼中并非“问题”，而这恰恰是社会科学必须介入、也正在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

高梦霞教授举了一个贴近日常的例子：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内容，大多是算法根据偏好不断推送的结果，看似“量身定制”，却在无形中放大了“手机上瘾”“社交媒体上瘾”的问题。“这个例子就是 AI 带给人类生活的一种负面影响，但 AI 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它只是忠实地执行算法。”她说。因此，心理学研究需要主动介入：社交媒体上瘾的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干预减少沉迷和依赖？是否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对高风险人群的使用进行限制？这些探究的本质，正是主动识别并回应那些“AI 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

在技术高速发展的时候，真正能识别风险、提出约束的是人。“AI 来了之后，大家一窝蜂地用，各种工具和信息涌入，如果你不去规范它的使用，它可能会涉及很多伦理问题，也会放大恐慌。”例如“AI 要抢走人类的工作”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需要被澄清和引导的社会情绪。“这个时候，心理学、法律等社会科学就必须介入，一方面纠正公众对 AI 的误解，另一方面参与制定规范，让技术在合乎伦理的前提下使用。”

从更宏观的治理层面看，康思勤教授也指出了类似的边界：当我们把 AI 引入公共决策和城市治理时，一个根本难题是——它仍然是一个“黑箱”。“即使它给出看似逻辑严谨的答案，我们也无从了解决策过程。”如果我们简单地把 AI 的结论当成理所当然，就会立刻遇到一系列伦理与治理问题：决策错了，责任由谁承担？是程序员、使用 AI 的部门，还是那条看不见的代码？在公共事务中，人们天然期待公平与透明——“我要知道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来的，否则很难信任它。”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在 AI 时代的使命愈发清晰：识别技术狂奔中被遮蔽的人本危机，参与设定边界和规则，确保在效率至上的叙事中，人类的价值判断、情感福祉与社会公平正义，始终在场。



◎高梦霞教授

## 港中大(深圳)的交叉学科实践

一个愈发清晰的共识正在形成：未来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注定要打破传统的学科壁垒，走向深度融合。康思勤教授判断，各高校将涌现大量跨学科专业，因为单一学科已经难以独立应对 AI 时代的复杂问题。高梦霞教授也持相同观点，“未来的教育不应是文理对立，而应是各有侧重的融合。”她认为，教育应在尊重学生兴趣与禀赋的前提下，强调能力的复合培养——为人文背景的学生注入计算思维，为理工背景的学生夯实人文底蕴。“这样，无论他们从事研究还是工作，都能理解数据背后的人文含义，让技术服务于有温度的问题。”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正在积极构建一个交叉融合的跨学科教育生态。学院下设应用心理学学部、中国研究学科部、国情教育部、计算社会科学学部、发展与治理学科部、通识教育学科部、全球与区域研究学科部、跨文化交流学科部、语言教育学科部和体育部共十个学部，不仅涵盖传统优势学科，更以前瞻布局，推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近年来，学院不断引入具有人工智能和计算背景的学者，共同探索如何以技术工具体察并回应“人”的真切关切。

其中，在 2023 年由人文社科学院唐文方院长发起创办的计算社会科学学部是最具代表性的布局之一。面对科学技术发展对人文社科提出的新要求，这一学部汇聚了政治学、心理学、传播学等不同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他们共同致力于将计算方法、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于人文社科研究。学部目前已开设硕士和博士项目，致力于培养既懂社会科学理论，又能运用 AI 与数据科学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交叉型人才。

跨学科的实践不仅发生在人文社科学院内部，更体现在与大学其他学院的积极联动中。高梦霞教授受邀在人工智能学院开设了一门面向大一新生的课程——“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s in Mental Health (机器学习在心理健康中的应用)”。在这门课上，她把应用心理学的前沿问题带入课堂，引导学生从一个紧迫的社会议题切入：在心理服务资源紧缺、成本高昂的背景下，能否借助大语言模型等 AI 工具，开发一种更普惠的心理健康筛查与辅助系统？

“我们带领学生以完成一个真实项目为导向，”高梦霞教授介绍，“目标是培养他们利用 AI 解决人文社科实际问题的思维与能力。”她发现，许多人工智能学院的学生对心理学和社会议题有着出乎意料的兴趣，这门课为他们打开了技术应用的广阔视野，也促成了理工与人文之间的双向滋养。

从顶层设计的计算社会科学学部，到一线课堂的跨学院项目制课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实践表明，人文与科技的融合并非空泛口号，而是可执行、可触达的教育创新。人文社科学院也正以“主动融合”而非“被动适应”的姿态，重新定义技术时代的社科教育。在这里，交叉学科的培养正在孕育这样一批未来人才：他们既能理解复杂世界的结构，也能运用综合工具去改善世界，并有能力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又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

# 离开 or 坚守？ 她的第三种选择

## 对话翻译专业学生武依亭

采访 / 徐涵 张筠尉



撰稿 / 张筠尉

PART 3

当全社会热议人工智能时代下高校各个专业前景时，翻译专业始终站在“最容易被替代”的风口浪尖。是离开，还是坚守，这几乎是每一位翻译学子都绕不开的问题。来自人文社科学院翻译专业的大四学生武依亭，却给出了另一种回答：不是简单地转身离开，而是主动走向更复杂的交叉地带。

### 语言之外：架起真正可对话的桥梁

翻译专业的学习远不止“把 A 语言变成 B 语言”那么简单。武依亭介绍，课程内容涵盖笔译与口译两大方向，但不强制分流，学生可以在两条线上自由选课。笔译课程重视翻译理论及翻译技巧的传授，口译课程侧重于口译技能的训练，从基础的交替传译训练起步，逐渐过渡到高阶的同声传译。

更重要的是，翻译从不局限在语言本身，而是需要不断接触新领域，理解概念、熟悉语境，再完成跨语言转换——一边学习翻译知识，一边学会在陌生的领域里站住脚。比如，财经翻译课要求学生真正看懂财经新闻和金融产品；法律翻译课让学生接触合同条款、判决书和法庭程序；艺术翻译课则将学生带进戏剧、歌曲与艺术展览的世界。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堂口译课会遇到什么主题，”武依亭说，“从花样滑冰到阿尔茨海默症，从足球到牛仔裤是怎么做出来的，都可能出现在录音里。每一次翻译都是闯入陌生领域的探险——你得先搞懂‘是什么’，才能用自己的语言讲清楚。”

在这样的训练中，翻译不再只是把话“说对”，而是帮助不同领域、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真正可理解、可对话的桥梁。

### 与 AI 共舞：在人机协作中探索边界

谈起 AI 对翻译专业的冲击，武依亭并不回避。媒体不断渲染“机器翻译要取代人工翻译”，各类报道里不乏“国际翻译名校停止招生”的新闻。有趣的是，越是在这种氛围中，老师们反而越有意识地把 AI 引入课堂，带领大家学习和讨论。

大三时，她提前选修了一门大四的高阶翻译课。整整一个学期，课堂都围绕罗湖区法院一份长篇医疗纠纷判决书的翻译展开。这次，老师和同学们没有“假装 AI 不存在”，而是直接把 AI 请上场：先对判决书进行切分，分别投喂给不同的 AI 翻译工具——包括国内和国外的，再把机器翻出的初稿一段段拉出来，对照法律术语、语气风格、目标读者做比对和修改。他们发现：在专有名词、法律条款引用、句式结构等高度专业化的部分，AI 的联网检索和数据库调用能力远远不够，大量工作仍需要人工查证与判断；一些 AI 工具会通过调整语气让译文在风格上更加优美和多样，却恰恰因此违反了法律对术语精确性和规范化的要求。

“那门课上，我们其实是在认真探索：AI 到底能做什么，哪一部分是它的长板，哪一部分仍然需要人类来兜底、来创造。”在武依亭看来，翻译专业与其说在“被 AI 冲击”，不如说正在通过与 AI 的协作，逼着自己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技术不

断演进的时代，人类译者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她认为，翻译真正不可被取代的，是创新能力和对陌生场景的开路能力。当一部全新的电影、一项新兴的技术、一个尚未成型的语料库出现时，第一步的学习与翻译，仍然需要由人来完成。

## 那一堂法庭口译课，推开另一扇门



◎法庭口译课

从自幼受到爷爷从事外事接待工作的熏陶，到高中选择就读外国语学校，再到保送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读翻译专业，武依亭对语言的热爱未曾改变。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译员，似乎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选择。直到大三的一堂法庭口译课，将她推到了一个新的路口。

那节课里，老师选取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诉孙杨和国际泳联案的材料，让同学们模拟口译。“我自己很喜欢游泳，也在学校比赛里拿过奖，所以对那场听证会印象特别深。”她说。在反复研读材料和视频的过程中，她注意到一个细节：庭上没有中国仲裁员，就连孙杨的代理律师也是外国人；现场负责翻译的人虽然懂中英双语，却并不真正熟悉仲裁规则和法律细节，“所以整个听证会的沟通就会显得很尴尬、有很多误解。”

那一刻，她第一次强烈感受到一个现实的缺口：既懂法律、又真正懂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在国际仲裁场域里非常稀缺。

“如果是我站在那个位置，我会怎么翻译？我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这个念头开始在她心里扎根，她随即开始了高密度的法律学习与相关实践——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自学民法和刑法；创办法律学会并担任副会长；和同学组队前往马来西亚参加模拟法庭比赛，作为全场唯一一个不是来自法学院的队伍，最终夺得四强。

这些经历不仅让她积累了法律知识与实践经验，更重要的是，让她看见翻译与法律结合所可能释放的能量。如今，武依亭已保送至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从翻译到法律，看似跨界，实则贯穿着一条清晰的线索——她始终在探索语言与其他学科交叉的可能性。



◎LAWASIA 模拟法庭比赛

## “被谈论”出来的焦虑

对于翻译专业的未来，武依亭持乐观态度。“其实我们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种‘被谈论’出来的焦虑。作为学生，我们目前感受到的还不是那种‘裁员’‘降薪’的直接冲击，这种焦虑来源于——你会不断问自己：我学的东西还有用吗？我还能做什么？但真正留在这个专业里的人，都是对翻译很感兴趣、真正想深耕这个领域的人，他们的焦虑反而会少一点。”

她的定力也来自大学四年的“可能性实验”。“学校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只要你愿意伸手，几乎总能触碰到你想尝试的方向。”在深圳市外办实习时，接待老挝部长团；投身模拟法庭，创办学术组织；学习编程，开展句法复杂度相关的量化研究；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暑课上，跨界选修蜜蜂生物学，享受了西班牙的悠长夏日——这些真切实践过的节点像无数个锚点，将她的个人能力与真实世界紧密连接，织成一个细密而坚韧的自我网络，足以抵抗外界的冲击。

“未来不太可能是‘人被AI取代’，而更可能是‘不会用AI的人会被用AI的人取代’。”她说，“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赶在AI前面，而是想清楚——在这个时代，我能把自己的能力用在什么地方，解决什么真实的问题。”



◎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暑课跨界选修蜜蜂生物学

# 理想与现实之间： 一名文科生的“焦虑”与“不焦虑”

## 对话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学生 吴镒

采访 / 徐涵 张筠尉



撰稿 / 张筠尉

PART 3

“读文科有用吗？”成了许多文科生绕不开的问题。一边是全球高校缩减文科专业、就业形势趋紧带来的现实压力，一边是对公共事务、社会公平和人类命运问题的持续关切。夹在这两股力量之间的年轻人，既难免焦虑，又不甘只用“好不好就业”来定义自己的学习与未来。

吴镒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的大二学生，他一方面清楚地感知到就业环境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坚持着“把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做好”的笃定。在他的身上，“焦虑”与“不焦虑”并行不悖，也许折射出的是这一代社科学生的共同心境。

### 选择：把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做好， 自然会有出路

吴镒的兴趣萌芽于初中时期，“我从初中开始就对国际关系、政治经济这些领域比较关注，我们学院还有城市管理、应用心理学等专业，都挺好。但我一看这个专业的名字，就知道大概是最关心的那块。”

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尽管面对家人“不好就业”的忧虑与“会计、金融更稳妥”的建议，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所年轻高校的新兴专业：“我觉得把未来规划得太好了，其实未来也不一定按规划走。既然未来没法完全把握，不如先学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把喜欢的事情做好，自然会有出路。”

“当时，港中大（深圳）是第一年开设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这个本科专业，我们是‘从0到1’的一届。”吴镒坦言，这种“开荒”状态既带来不确定性，也意味着更多的自主空间。这个学期，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的同学们发起成立了“全球研究学会”，吴镒被推选为会长。他们策划讲座、组织与教授的交流会、发布分析时事的文章，“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评论文章也受到了校外的认可。腾讯新闻的国际部邀请学会入驻平台，大家都觉得‘被看见’了——这是我们自己争取的机会。”

### 修炼：从前的我不曾想过， 公开演讲会变成我的强项

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的课程，几乎天然地对接着当下最复杂的全球议题：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外交学……再加上学院层面的基础课——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导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

在外人看来，这个专业常常讨论的是全球性的大议题，不免显得遥远而宏大。但在课堂上，老师们各出奇招，用丰富的形式把抽象的全球治理问题“搬进”课堂。让吴镒印象深刻的一门课是“全球化与中国”，他们曾在课上以模拟法庭的形式围绕美国对抖音的审查争议进行“开庭”，同学们分组扮演不同角色，他所在的小组站在平台

一方。“其实没有要求你有很强的法学背景，法律条文都可以自学、查资料。老师更看重的是，你用什么分析框架、站在什么立场去看这个事件。”

小班教学、大量的小组展示、课堂汇报，让表达与讨论成为日常。“高中的时候，我在公众场合讲话是很困难的。来这儿一年半，我现在甚至有点擅长做 presentation（课堂展示）了。”他笑着补了一句，“Presentation 多的课，我反而更容易拿高分。”这种转变源于专业对批判性思维和沟通能力的双重要求与训练。

## AI 是工具，也是“树洞”

### ——但它没有立场

在吴镒的学习和生活中，AI 已经是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翻译英文文献、润色写作语法、分析数据，这些都经常用。当然，都是在学术规范之内使用。”他解释，多数任课老师如今都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AI，只要求在论文中注明使用方式。

但在不断的试验中，他也看到了边界。有一次，他尝试让 AI 帮自己为作业设计几条“新颖的问题”，结果发现这些问题要么套路化，要么为了新奇而新奇，“跟我自己真正关心的东西，还是有一点距离。”

比起这些技术性的用法，他也坦诚另一种使用场景——情绪支持。“有很多有情绪的时刻，我会去找 AI 倾诉。我觉得它的回答，比很多人要有温度得多。”人生困惑、未来规划，与朋友或家人难以启齿的纠结，他都试着在对话框里摊开。“所以如果有人问，共情能力是 AI 无法替代的，我其实不太敢认同。我自己的共情能力、批判性思维，AI 很多时候都做得比我好，这也是我真实的焦虑。”

当被问到“社科学生无法被 AI 替代的素养是什么”时，吴镒给出的答案是：价值观和信念。在他看来，AI 再强大，它的输出始终被输入的价值观所约束——“你给它什么样的价值框架，它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而社科训练最重要的，恰恰是让人不断追问：我为什么学习这些？我将来要为谁说话、为谁做事？“选择这个专业的同学，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理想主义：社会公平、消除不平等……这些词听起来很大，但如果没有这套价值观支撑，只讨论制度设计和技术工具，其实是空的。”

## 出路：

### 在 AI 时代坚持“没那么实用”的选择

全球高校文科收缩的趋势，他并非不知。“我也挺焦虑的。”他坦言。

但焦虑的另一面，是一种清醒的坚持。“恰恰是在经济不景气、社会矛盾更突出的时刻，更需要有人去反思和改革整个分配系统，去重新设计游戏规则。这个工作，不可能交给算法。”这个选择听上去有点理想主义，也有点倔强。但他身上那股“把感兴趣的事做好”的笃定，或许正是应对变局的关键。

关于未来，他的想象务实而开放。“有一些事情是我确定不会做的，但我不敢说自己一定能做到什么。就像导师跟我说的，他十年前也想不到会在中国的大学当老师。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眼前的事尽量做好。”

在算法日益定义世界的时代，如何为“人的价值”保留一片不可替代的领地？

吴镒和他的同学们正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这条路注定伴随着焦虑与不确定，但也正因为这些思考与选择的存在，那个被技术和效率驱动的世界，才得以保留一片不可或缺的、属于人文的温度与光芒。



◎模拟法庭课堂合影

# PART 4

## 人文社科的远见： 在多元复杂的社会中 培育创新者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东京大学教授吉见俊哉在《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一书中对比了文科与理科的本质差异：“理科的学问偏向按照给定的目的制造出最‘有用’之物。在这样作为工具、手段的有用性方面，理科远胜文科确是事实。”而文科的独特价值在于“创造价值的有用性”，即“将那些可能在较长时间段中发生变化的多元价值尺度纳入视野的能力”。当价值尺度频繁颠覆时，“如何创造新的价值尺度？如何评价新尺度？这正是文科的核心领域。”这种差异在 AI 时代恰恰凸显了后者的不可替代性——当算法的“完成目的”能力已臻极致，唯有人文社科能穿透技术表象，思考触及文明根基的问题。

人文社科的诞生，本就是对价值尺度剧烈变化的时代的回应。吉见俊哉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主要人文社会学科的共同问题是什么？答案就是‘价值’——当‘神’作为绝对价值来源的信仰崩塌，“何为价值”成为文科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这种追问在 AI 时代更显迫切：算法能优化资源分配，却无法判断“优先救治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此时伦理学、社会学、哲学等人文社科提供了价值坐标系；AI 能模拟神经突触，却无法感受指尖触碰薄荷叶的毛茸茸，更无法理解母亲眼神中的默契。这种身体性的生命体验——爱、尴尬、死亡、共同体记忆——构成了人类理解世界的底层代码，而人文社科正是守护这些“非算法知识”的基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育的转型恰是对这种价值重构的回应。在知识获取日益便捷的今天，学校的核心功能不再是单向传授知识，而是成为师生间“生命经验共享”的场域。校长徐扬生教授指出当前教育过度强调“记忆”而忽视“体验”：“我们目前的教育70%是记忆，理性占20%，创造力占5%，品性大概是5%。”他倡导“少‘教’一点，多‘育’一点”，感情、创造、个性，这才是我们教育的真正重点。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是实践的教育，是创新的教育。

# 跨界生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人文社科的“转换密码”

## 对话人文社科学院毕业生 马笑元和吴依韦

采访 / 李佳阳



撰稿 / 徐涵

PART 4



◎吴依韦↑  
◎马笑元←

当算法重构世界的运行逻辑，当技术迭代加速知识的折旧速率，人文社科如何为年轻人注入穿越变革的“核心动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毕业生马笑元与吴依韦的跨界轨迹，给出了生动注解。她们的故事不仅勾勒出港中深学子独特的“跨界基因”，更印证了人文社科教育的深层价值——在多元复杂的时代，以深度理解、系统转化与价值反思的核心素养，培育守护人性温度、架接跨界桥梁的创新者。

### 从语言共情到生命联结：

### 跨学科沃土培育的“人文医疗者”

2019级毕业生马笑元的大学生涯始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祥波书院、人文社科学院翻译专业。这一学科训练远不止于“双语转换”，而是被定义为“深度理解与共情的艺术”。她回忆：“老师要求我们‘用专业译员标准要求自己’，从译前准备的文献调研到现场反应的精准度，每一个细节都在塑造‘以对方为中心’的思维习惯。”这种训练让她逐渐意识到：翻译的本质是“消除隔阂”——无论是语言隔阂、文化隔阂，还是专业知识与公众认知的隔阂。

大二那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成为她职业转向的契机。“个人选择与社会国际形势息息相关，”她敏锐观察到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开始思考如何让“沟通”能力锚定更具体的社会需求。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力学（Audiology）领域进入她的视野：“西方大部分学术框架中，听力学隶属于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Disorders，核

心是帮助听障人群跨越‘声音信息理解’的障碍。这与翻译的使命惊人相似——都是为了让信息流畅传递，让人与人真正连接。”更意外的是，申请听力学研究生所需的语言学、语音学等课程，恰好在港中深翻译专业的培养方案中覆盖——跨界的种子，悄然萌芽。

跨界的种子需要土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教育理念，为她打破了学科边界。“我需要修读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作为 pre-requisite，但作为人文社科学生，在很多学校跨学院选课几乎不可能。”她主动联系医学院朱宝亨教授和郑仲煊教授，他们不仅耐心了解她的规划，还为她协调课程名额。这段经历让她得以在翻译理论与内耳构造图之间切换，逐渐构建起“语言-生理-心理”的复合知识体系。而港中深与国际接轨的教学模式，更让她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研究生阶段无缝衔接——“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临床模拟，这些在本科早已习以为常。”

真正的挑战始于加拿大的临床实习。“听力学领域99%的从业者是本地白人，患者多为70岁以上老人，对语言清晰度和文化敏感度要求极高。”第一次独立接诊时，她因紧张而说话磕绊，“连握手都在抖”。但翻译训练赋予的“换位思考”能力此时开始显现：“如果我是患者，面对一个技术再好但冷冰冰的治疗师，也会感到不安。”她开始用“跨文化经历”作为沟通媒介，介绍自己的求学生活经历，作为打开和病人聊天的引子，用人性的共通之处作为支点，取得病人的信任。这背后，是港中深人文社科教育赋予的“敢想敢做”的勇气与“以对方为中心”的思维习惯，让她在医学与人文的交汇处，成为传递温度的“生命翻译者”，用共情力守护着技术无法触及的生命体验。



◎马笑元在实验课上

## 从文本分析到商业解码： 通识教育浇灌的“社会问题解读者”

2017级思廷书院、人文社科学院毕业生吴依韦的跨界路径，则始于对“人口老龄化”与“医疗资源错配”的观察。“疫情期间看到慢性病老人‘一床难求’，让我思考如何用‘更灵活的社区医疗’盘活资源。”这种追问，推动她将翻译专业的“系统思维”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场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的通识课程为她打开了跨界的窗口。“通识课程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经济学、理工科等不同领域知识，跨学科视野让我不再局限于



◎吴依韦在医疗头部制造企业进行产品讲解

单一专业的角度，也更有勇气去尝试把不同领域的思考融合在一起，去回应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她发现，翻译训练的“情理交融表达”与“文本拆解逻辑”，恰是连接公共卫生与商业实践的桥梁。本科期间，吴依韦在互联网与制造业的多元实习经历，更锤炼了她稳定的节奏感和强韧的心智——这种特质，成为她申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与传播专业的独特优势。“面试时，我能把实习经历和项目思考组织得既有逻辑框架，又有温度细节，这或许是人文背景赋予的独特竞争力。”

如今在新氧健康负责策略运营，吴依韦面对的是互联网医疗领域的快速变化与复杂挑战。她认为，人文社科教育培养的“敢于提问”与“善于拆解”能力是应对挑战的核心：“批判性思维教会我的不只是‘思考’，更是‘沟通’——面对不合理的任务安排，能有理有据地提出疑问，推动双方找到更优解。”而处理复杂问题处理和“敢于提问、善于拆解”的能力，源自港中深高频次的小组报告与专题研究训练：“本科时习惯了在 deadline 前拆解课题、分配精力，这种系统思维迁移到工作中，让我能冷静应对突发项目，一步步推进目标。”

## 结语：人文社科的“无用之用”， 跨界创新的“价值锚点”

从听力学诊室的跨文化共情，到互联网医疗的策略创新，马笑元与吴依韦的跨界轨迹，生动诠释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教育的独特基因。它以通识教育为根基，打破人文与科学的壁垒，通过“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视野，为学生构建贯通多元领域的知识网络；更以人文与科学的交互为创新引擎，将深度理解的共情力与系统转化的逻辑思维熔铸一体，淬炼出应对复杂现实的“跨界密码”——让人文温度指引科学方向，让科学严谨支撑人文深度。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人文社科教育，始终以“跨界创新”为内核。当技术将“完成目的”的工具性能力推向极致，正是这些关于“如何理解人性”“怎样评价价值”的人文思考，构成了驱动变革的创新源代码。而这，或许正是人文社科在 AI 时代最珍贵的“转换密码”。

# 大学的定力： 在喧嚣数字时代 守护人文社科的“长线价值”

撰稿 / 徐涵

PART 4

**“人类因为创造了人工智能而伟大，因为知道人工智能的局限而成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徐扬生



◎校长徐扬生教授谈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当全球高校陷入“砍文科、追STEM”的集体焦虑，当教育越来越被短期效益裹挟，大学的真正定力，在于守护人文社科的“长线价值”。校长徐扬生教授在谈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时强调：“对世界文明的真正贡献不在于人口多少，不在于高楼大厦，不在于科技发展，是在这个国家和这个地区造就了什么样的人。”这一判断直指教育的本质——培养有灵魂、有温度、能反思的完整的人，而非被技术异化的工具。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师讲堂嘉宾彭慕然教授的研究为这种教育理念提供了深层注解。他指出，AI在辅助学术研究中展现出巨大潜力(例如快速检索分析古代文献以推测残缺内容)，但本质局限在于“整合传统智慧”而非挑战它：“只要我们将挑战传统智慧视为己任，AI就无法取代我们。”若教育仅满足于知识传递，AI或可取代；但当教育致力于孕育“敢于质疑、善于反思”的独立心灵，人类思维便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李海洲教授则从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视角，进一步印证了人文社科的核心价值：“人工智能的核心是让机器像人一样理性思考和行动，但理性的规则与道德规范，本身就需要人文参与。”他以“交通规则”作喻：“制定规则不仅需要工程师，更需要懂伦理、社会与管理的人。”这正是港中深将通识教育与AI教育系统结合的初衷——让技术人才既掌握“造工具”的能力，又具备“定规则”的素养，而这离不开人文社科对价值判断的滋养。

## 港中深实践：人文社科的远见

### ——在技术与人性交汇处培育创新者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揭牌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通识教育,以“解放你自己”为初心,在算法定义效率的时代,为学生提供了一段珍贵的“思想余裕”。通过《与人文对话》《与自然对话》等核心课程,通识教育打破人文与科学的壁垒,引导学生在经典文本与跨学科碰撞中练习批判、感知共情。不同于传统院校的知识灌输,这里的小班研讨(seminar)鼓励学生与不同专业背景的同伴激荡思维,在“允许试错、允许迷茫”的安全空间中,培养“Think out of the box”的勇气。正如胡晓倩教授所言:“通识课的意义,不在于让你GPA更高、工资更高,而是在30年后的人生低谷时,能想起当年讨论‘人为何活着’的瞬间——那些看似‘无用’的思考,会在未来长成支撑你前行的大树。”这种教育不追求即时效益,而是种下一颗“心理繁荣”的种子,让学生在30年、50年后仍能回望大学时的追问,在技术洪流中锚定自我价值。

面对AI带来的社会重构,港中深人文社科学院以“人文+科学”的交叉实践,主动破解技术盲区。通过计算社会科学、应用心理学等交叉领域的探索,主动回应那些“AI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当算法推送加剧“信息茧房”,心理学研究介入社交媒体沉迷机制的干预;当AI决策的“黑箱”威胁公共治理透明,社科学者追问责任伦理与公平边界。高梦霞教授在跨学院课程中引导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思考:“技术能告诉我们‘如何实现’,但社科追问‘为何实现’‘为谁实现’。”这种“人文算法”的培育,让学生既能驾驭技术工具,又能以共情力识别弱势群体的沉默、以批判性思



◎通识教育专场系列讲座海报

维反思系统失序——正如康思勤教授强调强调大学教育的核心:“始终是培养一个在思想上健全、能独立判断的‘人’,而不是为技术流水线加工‘更听话的工具’。”成为“既懂代码,又懂人的温度与社会复杂”的创新者。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教育实践揭示:真正的大学定力,在于以人文社科的远见为锚,在技术狂飙中守护文明的价值根基。人文社科不是技术的对立面,而是为创新注入灵魂的“价值校准器”——它教会在数据洪流中辨别意义,在效率至上的逻辑中追问伦理,在工具理性的狂欢中锚定人性尊严。这种“价值创造力”,让创新者不仅成为技术的驾驭者,更成为文明的塑造者——他们懂得用人文智慧为科技发展定向,用社会关怀为技术应用设限,最终实现“工具为人”而非“人为工具”的根本目标。

带着这样的教育远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变革时代正培育着一批批“有温度的创新者”:他们左手紧握技术工具,右手持守人文火炬,在多元价值的交汇处开辟新路径,让每一项突破都扎根于对人类福祉的深切关怀。这正是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对人文社科“长线价值”的深刻践行——让技术进步始终与人性光辉在这片校园同频共振,为每一位学子注入在多元复杂社会中领航创新的信念,成为守护文明火种的坚定力量。

# “柔”性共生： 张敏教授与她的双重探索

学生记者 / 王艺臻

编审 / 张筠尉

# %

## 人物简介

张敏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教授，校长学者。拥有近20年微电子领域的研究经验，曾任职于晶门科技(香港)，与全球知名企业共同研发先进半导体器件；于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薄膜晶体管与先进显示实验室副主任、纳米电子与柔性电子实验室创始人等职位；于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任职研发总监。研究领域为后摩尔时代新型微纳电子器件，包括柔性电子、神经形态电子、低维材料电子、柔性显示等。



## 引言

当我们掏出手机、打开电脑时，很少会意识到：这些日常设备的“坚硬”，并非只是外壳手感，而是来自一整套被工业化固定下来的技术底座——以硅为核心的芯片、以玻璃背板为代表的显示与封装，让电子产品天然更适合“方正、平整、不可弯折”的形态。

可如果我们需要更“柔软”的电子设备呢——它能贴合皮肤，甚至随动作拉伸？

“传统的集成电路，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摩尔定律——硅一路走到三纳米的代际节点，再往下走就走到了物理极限。”张敏教授说，当这条路走到尽头，就需要“寻找新的光”。这束“新光”被称为“超越摩尔”——通过新材料、新结构、新集成形态，让电子系统获得全新的能力。她所专注的柔性电子正是其中的重要一支：试图把电子器件从刚性平面上“解放”出来，走向可弯曲、可拉伸、可贴合的形态。

## 从“坚硬”到“柔软”：

### 重新定义电子设备

要让器件真正“柔软”，创新首先发生在材料层面。张敏教授提到，相比已被研究得极其成熟、并实现大规模量产的硅体系，柔性电子会采用新的构造材料，例如金属氧化物、碳纳米管、新型二维材料等。“因为这些材料是低维的，有一些甚至是颗粒状的，最后能够成膜，它就具有本征柔性。”

采用新型的材料，张教授从电子工程角度入手，重点研究设计柔性器件结构、电路、以及系统集成。要么走“全柔”——组成晶体管的沟道、介电层、电极、背板全都得是柔性的；要么走“刚性岛”或者三维立体结构——把关键的刚性器件集成到柔性或可拉伸的柔性背板上，让系统整体仍然可弯折或拉伸。在新型器件的设计中，关键界面非常核心，很多研究是围绕着这些关键界面的机理、设计和制备中遇到的科学问题展开的。在柔性电路层面，可以采用传统的计算和存储设计方法；也可以是基于神经形态电子的感存算一体。

而真正决定技术能否走出实验室的，是工艺与产业的兼容性。张敏教授强调，

团队在推进本征柔性器件时，希望尽量“兼容原有的晶体管或显示面板的设备”，研究新的工艺方法，期待提高技术在未来落地的可能性。在她看来，面向未来的柔性电子，需要同时回答三个问题：如何“解决其中的科学问题”；如何“规模化做得出来”；以及如何“真正解决人们的痛点问题”。需要将材料、结构、工艺、集成方法及应用系统协同创新形成闭环，“柔软”才能从概念走向真实可用的下一代电子设备。

柔性器件可以应用到哪些场景？张敏教授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人体可穿戴健康监测，AI-on-Body：柔性器件可以像创可贴一样贴在皮肤表面，连续记录心电、脑电、肌电等生物电信号；也能走向血糖、神经毒素等生物化学信号监测；以及日常的温度、光照等生理事物信号。第二类是机器人感知，比如电子皮肤和机器人灵巧手的应用。让机器人表面像人的皮肤，让灵巧手像人手一样，能够感受温度、触觉、风、电等外界刺激，甚至超越人去感受到从红外到紫外的照射等，并把信号传输给机器人的“大脑”，让机器人不仅“能动”，也具备“感知”。第三类是人机交互，例如在智能假肢中，硬质假肢与人体软组织之间存在长期接触界面，若用柔性电子接口与柔性电路去贴合、监测与反馈，佩戴体验会更舒适，也更容易把界面的压力、响应或不适信号“读出来”。

张敏教授特别提到柔性电子皮肤或电子纹身。“未来在皮肤破损病人身上，用电子皮肤去替代或增强原本的人类皮肤。”电子皮肤不只是“盖住创面”那么简单，而是尽可能找回皮肤作为感知器官的功能：触觉、温度、痛觉。这种帮助也发生在心理层面，形貌上设计时尚，像一个“电子纹身”。“这样的电子纹身也可以是个日常饰物，来实时监测健康和状态。”在她的叙述里，柔性电子的意义不仅是把设备做得更薄、更轻、更柔，而是让技术更贴近人的身体与提升生活品质：当电子器件能够变柔软，修复与连接就有了新的可能。

当人体信号被持续记录，机器又逐步获得感知能力，边界似乎正在变得模糊，这种双向趋近不可避免地带来针对人类主体性、隐私保护、责任边界的伦理叩问：当人日益“数据化”，我们是否可能沦为被监控和优化的客体？当机器日益“感知化”，其“类人性”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人的数据隐私、自主性如何保障？具有感知能力的机器，其责任归属如何界定？针对这些担忧，张敏教授的答案是：“在我的理解中，科学研究的伦理基础就是所有的科学研究应该是为人类服务的，让人变得像机器一样精准，让机器人变得像人一样感知，都是为了让人类生活得更好，更加健康，更加愉悦。”

## 从实验室到社会：

### 用科研解决真问题

张敏教授的研究领域并不拘泥于电子工程这一方天地，在材料、物理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领域也有所涉猎。她把这种跨界归因于一种“工程思维”，即解决问题是第一性原理。“我深受导师和几位学术前辈的影响。导师曾对我们说：‘用一微米的设备制备一微米的线宽，那是制造；用同样的设备制备五十纳米的线宽，这才是创新。’科学研究本质是通过创新方法去解决科学问题。而科学问题本身从不囿于学科边界，在解决问题的目标导向和好奇心的驱使下，跨越学科的交叉合作和学习是不可避免的。”

从脑海中的构想到现实中的产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科学新技术到能够为社会创造生产力，这一段被称为技术转化的“无人谷”，如何打破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壁垒成为实现“产学研”结合的重要课题。

张敏教授虽没有第一手的创业经验，但基于自己的行业经验和观察，她将跨越柔性电子“无人谷”的关键归纳为技术、人与时机三大要素：第一，技术是根基，必须率先攻克核心科学问题，形成可工程化的技术方案，否则产业化之路将举步维艰；第二，人是核心，创业本质上是“创人”，团队的重要性超越技术本身，创业热情源于超越商业价值的使命感——改变社会、服务人类、践行理想，这种“压不住的热情”能支撑团队穿越成败波折，无惧考验；第三，时机决定成败，柔性电子的需求与老龄化、少子化的社会结构变迁息息相关，需要理解时代赋予的要求和机遇。

跨越柔性电子的“无人谷”，不仅需要“天时”与“人和”，更离不开一片能够滋养创新落地、让技术与产业无缝对接的沃土——这正是张敏教授喜欢深圳的原因。在她看来，深圳作为“硬件硅谷”，其最独特的优势在于完整、高效且充满韧性的供应链与产业生态。当一项新技术从实验室诞生，从柔性芯片制备、封装测试、到系统集成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能在珠三角地区找到成熟的协作网络。这极大降低了产业化的成本、风险与时间周期，为像柔性电子这样高度依赖先进制造的前沿领域，提供了将构想快速转化为产品的“地利”。

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则源于张敏教授内心深处对“人”的执着与对教育的热忱。在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双重历练中不断积淀之后，她更加确信，自己最不能割舍的，是与年轻学子相伴同行、见证他们蜕变成长的教育事业。

港中大（深圳）独特的氛围——传承严谨学术，拥抱产业前沿——为她提供了完美的结合点：这里既能延续她“以科研解决真问题”的产业视角，又能实现她“以育人塑造未来”的核心价值追求。大学开放创新的气场与她个人的志趣一经相遇，便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 教育的“柔”性力量：

### 大学科研的人本理念

与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第一性原理相比，张敏教授认为高校的第一目标是培养人才，这也决定了高校里实验室的本质——不仅是一个技术孵化器，更是一个“人的锻造场”。在她看来，高校科研的真正“产出”与企业截然不同，企业的核心产出是可量化、可上市的产品与服务，而高校最珍贵的产出，是完成了某种成长蜕变的人。

对即将踏上或已经走上科研道路的年轻人，她给出了四个朴素、却足够有力量的词——好奇心、基本功、韧性、利他心。

她恳切地希望年轻人能珍视并保护内心那份纯粹的好奇。这份好奇不应被功利的目标所裹挟，而是驱动你不断追问“为什么”的原始动力，它能帮助你在未来的波折与社会惯性的冲刷中，始终记得自己出发时的方向。

其次是学习的姿态。高校如同知识的海洋，她鼓励年轻人应像海绵一样，以近乎贪婪的态度去吸收、去积累知识。扎实的数理逻辑、深刻的工程思维、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开阔的商业视野，共同构筑起个体在时代变局中屹立不摇的根基。

同时，她坦诚地指出，在多数领域，人与人最终的差距往往不在于天赋，而在于持续的努力与面对挫折时反弹的能力。科研之路注定与挑战和磨练同行，这份心理韧性和耐受力将决定你能走多远。

她特别强调，无论未来是继续从事科研还是投身产业，甚至于生活中，任何重要工作和复杂事件的完成都离不开紧密的合作。真正的合作智慧在于“利他心”，即理解并成就伙伴的需求。这并非单纯的奉献，而是一种深刻的共赢。

“人生如一场单程的游戏，”张敏教授说，“我们奋力奔跑、攀登，其意义不仅在于抵达某个通关终点，更在于这个过程本身——为了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更惊艳的风景。生命的价值在于充分体验，而非追求虚幻的完美。所以，勇敢一点，奔跑吧，少年！”

# 音乐治疗师梁晓盈：

以科学的音符，谱写“人”的疗愈



学生记者 / 王哲

编审 / 李佳阳

## 引言

“鼓。”这个简单的字，对于一个三岁的小孩来说，却是一次令人惊喜的突破。这是一个几乎从不表达的三岁孩子，第一次主动表达自己的诉求，在此之前，他的不安和需求都淹没在阵阵哭声中。这是音乐治疗师梁晓盈在美国实习时的一次治疗，她永远记得这一刻——这个孩子用手指着鼓，第一次主动开口，表达自己。“音乐治疗用音乐作为工具，要将音乐解构，再把它转化为日常可用的元素，思考如何用这些元素帮助患者。”音乐治疗并非简单的“听音乐就能好”，它是一门将音乐解构、重组并转化为生活工具，再用这些工具帮助患者的科学。“艺术需要实践，要落地到生活。”在科技浪潮席卷的今天，梁晓盈老师以多年临床与教学经验，带我们拨开“音乐治疗”的迷雾，探寻艺术与科学的交汇点。



## 人物简介

梁晓盈 ( Angel Hiu Ying LEUNG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 ( 深圳 ) 音乐学院教师，同时拥有美国及加拿大注册音乐治疗师、注册脑神经音乐治疗师及新生儿重症监护音乐治疗师资质。她于西密歇根大学取得音乐治疗一级荣誉硕士学位，师从国际知名音乐治疗学者 Brian Wilson 教授与 Edward Roth 教授。多年来，她持续为不同群体提供音乐治疗服务，服务对象涵盖言语发育迟缓的儿童、智力与情绪障碍青少年、认知障碍长者等。此外，她也在多家机构开展音乐治疗讲座与培训，致力于推动音乐治疗的专业普及与公众认知，并持续开展相关应用研究。



## 剥开音乐治疗的芯

音乐治疗的本质是什么？梁老师这样解释，“音乐治疗是用音乐帮助人提升身心健康。”许多人误以为“听音乐 = 治疗”，实则不然；真正的音乐治疗，核心在于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互动。梁老师分享了音乐治疗常用的四种方法，分别是聆听音乐、演奏音乐、即兴音乐、创作音乐。这是四种来访者与音乐互动的不同方式，它们并非娱乐，目的是为了用音乐帮助来访者达成目标与治疗目的，如提升社交能力、建立生活技能、促进自我表达等。很多人以为不需要音乐治疗师，音乐本身就有“疗效”，但这不是“音乐治疗”。“音乐治疗”必须由专业注册的音乐治疗师主导，利用治疗师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判断和干预。

在梁老师看来，音乐治疗的魅力之一，在于它能服务于生命的各个阶段——从新生儿到长者，贯穿一生，无论年龄、能力或背景，每个人都可能从中受益。她强调，音乐治疗师需要准确识别个体独特的内在需求，并用音乐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例如，对有认知或心理挑战的儿童，音乐活动能帮助他们在韵律中学习自我照料等基础技能；青少年可通过歌曲创作探索自我、建立自信；成年人则能在音乐中释放压力、获得情绪支持；老年人借助音乐改善社交、缓解孤独；而对痴呆症等神经障碍患者，音乐能调节情绪、促进交流，成为情感的桥梁。梁老师也特别提到常被忽视的照护者群体——他们长期承受身心压力，音乐治疗能为其提供“属于自己的时间”，帮助他们表达与调节。即便在同一群体中，每个人的需要也各不相同，“精准看见并回应真实的需求”，正是音乐治疗师工作的核心。

## 先成为音乐家

成为音乐治疗师，音乐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梁老师指出：“要先成为音乐家，才能成为音乐治疗师。”若无法通过音乐营造出吸引人的环境，患者便难以投入互动，医学知识也就无从施展。

在音乐素养方面，即兴演奏能力是重中之重，梁老师结合自己的经验谈到：即兴属于创造音乐，而音乐表演多是对已有作品的再现。用心“听世界”，需要治疗师留意并记住各种声音，留意快乐或忧郁时不同的声音表达，积累对情绪的细腻觉察。她认为，治疗即生活，觉察越深，越能在即兴中组合出贴合来访者的音乐语汇。当然，这一切建立在扎实的传统音乐训练之上：和声、练耳、移调等基础能力，是即兴得以自由生长的土壤。

与此同时，医学与心理学知识赋予治疗以精准性。了解发展心理学，能帮助治疗师对不同年龄的来访者形成合理期待；掌握病理学，则使其在面对 ADHD、ASD 等诊断时，能更准确地理解症状背后成因，从而设计出真正个性化的干预方案。音乐与医学，如同双翼。需要平衡发展，音乐治疗师才能陪伴来访者，在旋律中达到疗愈的效果。



## 一颗爱你的心

“音乐治疗师需要的是‘喜欢与人打交道’的人。我们的教育会教学生如何把音乐技能用来帮助人，但很难教你‘一颗帮助人的心’。”

进入音乐治疗，音乐能力与人格特质同等重要。梁老师认为，成为一名音乐治疗师，首先要对“为人服务”怀有热情。如果只钟情于音乐或只专注于医学，都不够合适——因为音乐治疗的核心始终是“人”。此外，真诚的同理心与细腻的觉察力也至关重要，能够将他人需求置于自我之前，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为此，梁老师始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在她看来，志愿经历不仅能培养共情、拓宽视野，更能让人学会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她建议，不仅是音乐治疗专业的学生，每个人都应当尝试参与志愿服务，这对任何领域的成长都大有裨益。即便是短期的志愿活动，也能改变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拓展解决问题的路径，并逐步建立起稳固的同理心。但同时，也要学会完整地看待世界，“不能只看好的，而忽视那些不够好的”。梁老师分享了她在香港大学第二年暑假时参与的一个为期八周的项目：用音乐走进社区，服务社区。“那个时候我意识到，音乐人常喜欢与‘聪明人’接触——彼此敏捷，聪慧，交流顺畅。而音乐治疗师要面对的常常是不同的人——他们很可能患有各种障碍或者疾病。我想看看自己能否与他们很好地相处，是否会害怕或者厌烦。既然想做音乐治疗师，就应该用时间与专业来检验自己是否真的合适。后来我发现这很有意义，于是申请读研，成为音乐治疗师。”这段经历让她确认了自己的选择，也促使她最终走上音乐治疗的道路。因此，她建议年轻人应尽早通过实践去了解自己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合某个专业，深入认识自己，探寻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价值，避免将时间与金钱投入并不热忱的领域。



## 拒绝“一刀切”

“作为音乐治疗师，我们不做‘音乐处方’。”面对如今 AI、VR 等技术兴起，有人提出能否通过这些技术实现个性化的“音乐处方”，梁老师对此认真回应：音乐能疗愈人，但也可能造成伤害。例如，海浪声、流水声对多数人有舒缓效果，但对曾有溺水经历的人，却可能触发创伤记忆，加重心理负担。因此，音乐治疗不以“处方”形式推荐音乐，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必须基于对来访者经历与状态的充分了解，才能判断何种音乐互动是安全、有益的。在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中，温度和临场应变能力是无法被替代的。

而技术可以成为有效的辅助工具，尤其在拓展服务的可达性上：疫情期间，远程技术维系了治疗连续性；如今，它仍能帮助偏远地区的群体获得支持，降低接触门槛。从前，治疗师需携带实体乐器，如今通过电子设备，即可模拟各种音色，极大地减轻了携带负担，同时又丰富了治疗师的“工具箱”，仿佛把管弦乐队带来到来访者面前。现今电子作曲软件已经实现将随意的哼唱识别记录并转成音轨，转化为完整的乐曲，帮助来访者创作音乐、建立自信——即使不懂乐理，也能通过音乐表达想说的话。

同时，也有声音希望 AI 来扮演“对话者”——类似一个“电子音乐治疗师”，通过识别情绪来推荐音乐。梁老师指出，这存在很大局限：一是“处方式”推荐本身具有风险；二是 AI 无法胜任情感回应与临场干预。例如，当来访者在治疗中情绪崩溃、哭泣不止时，治疗师可以即时调整节奏、给予安抚，而 AI 难以处理这样深层、动态的情感互动。因此，技术虽能丰富“工具箱”、提升效率，却无法替代治疗师面对面互动中所承载的温度、共情与临场判断。在音乐治疗中，人才是疗愈的核心，技术始终是为服务的工具。

## 把盒子留在门外

在深入了解音乐治疗的科学后，我们最终回到另一个重要的主体——音乐治疗师本身。音乐治疗师的工作是一场持续的给予，既要背负自身的行囊，也需要平稳地托住来访者的情绪重担。如果不能找到有效的“清空垃圾”的方式，可能会被拖垮，影响到自己。梁老师提出了三个自我关怀的方法来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把盒子留在门外——意指把个人情绪留在门外，工作时带上“面具”，以专业状态全情投入，在工作之余找到释放压力的途径；第二，找到自己的界限在哪——不追求事必躬亲的完美，学会求助更加专业的人；第三，不要轻易归因到“我”——想清楚来访者的言语、行动不是针对治疗师个人，多是由他的病症导致的，不能自控。实践这些方法也需要时间，但它最终抵达的，不仅是对他人的疗愈，也是对自我的修炼。在门外卸下自身的负累，守护自己内心的旋律，在疗愈世界的交响中，完成自我的修行。

# 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挑战

——专访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肖耿教授



学生记者 / 常浩哲

编审 / 北海

## 引言

当网络空间弥漫着对往日经济高速增长的怀念与对当前转型阵痛的迷茫，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图景与未来方向？面对这一时代之问，肖耿教授娓娓道来，为我们展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全景图：从过去到现在，从国内到海外，肖教授由浅入深，指明了未来的方向。作为一名长期活跃在政策实践前沿的学者，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从实践中创造，在实践中检验复杂开放大系统理论，特别是深刻解释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在采访中，肖耿教授不仅深入剖析中国经济的现状及面临的机会与挑战，阐释其独到的“政府-市场”有机体理论，更结合其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实践，为政策制定提供创新思路，为身处人工智能浪潮与时代变革中的青年人指明行动方向。通过他的解读，我们得以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看见转型的逻辑、前行的路径，以及一位学者将理论扎根于实践、以智慧回应现实挑战的深刻努力。



## 人物简介

肖耿教授是一位深具国际视野与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及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并担任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他拥有中国科技大学学士学位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学博士学位，学术与职业履历横跨东西方，曾任职于世界银行、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并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全球中心主任等职。他的研究扎根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核心专长涵盖宏观经济、金融改革、汇率政策及制度经济学。

肖耿教授注重实地调研和“复杂开放大系统”研究方法，其工作紧密连接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深度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平台建设，是香港特区、深圳、及国家部委的专家顾问，长期为中国金融行业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创新提供关键创新政策思路，特别在推动深港规则衔接方面提出跨境“双总部”运作机制。他的研究成果通过学术专著、期刊论文及《报业辛迪加》全球专栏等多种形式，在国内外学术界、政策界及公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 中国发展以及中美关系： 对复杂经济现状的宏观解释



近期网络上盛行起怀念“经济上行期的美”的潮流，这是因为许多网友直观的感受近期与之前经济形势的不同，却不知道具体差异和转型原因。面对这个问题，肖耿教授带领我们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一路溯源，深刻了解中国经济现状背后的推动力。

从改革开放前中国总体供应短缺，到目前工业产品品类齐全，整体物质供应大幅改善，我们主要是得益于国家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的大规模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创造许多关于房地产和消费品市场的成功故事，谱写了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全球经济史上的重要篇章。那时的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海内外强大的需求，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生产力爆发，经济恢复后的人口迅速增长，及世界经济总体开放包容的大环境。多种因素

对需求的强大支撑造就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特色：经济在“量”与“价”上的高速提升。

但如今，驱动增长的动力已经改变，导致经济的发展形态也随之转变。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中国拥有无与伦比的强大供给能力，能够生产出供应全球的商品，但国内消费市场的潜力尚未完全释放。与此同时，我们在新兴科技与产业领域投入巨大，目的是在关键短板环节奋力追赶。而在传统支柱产业，国家也在进行必要的调整与重塑。这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图景：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稳健，但不同行业冷暖不一，部分关键传统领域，如房地产行业，资产价格面临压力，这正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的阵痛。海外不确定性的提升与全球需求受到地缘政治冲击的现实，都在推动中国提振内需，改变观念，从追求商品和 GDP 的供应能力转变到聚焦新质生产力、民生质量、及民富国强。

在总结完中国经济现状之后，肖教授同时指出，国家近期提出的一系列新政策的大方向其实是实现民富国强长期目标，体现的是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从过去 40 多年主要聚焦生产能力，转向在补齐生产能力短板的同时提高百姓的收入、财富、及消费水平。这不仅是共同富裕的要求，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也是促进国内消费的关键。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既是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也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从贸易合作到贸易战，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转向有深刻的结构性根源：美国长期习惯于消费主导，导致过度消费及储蓄率太低，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而中国则长期保持高储蓄、高投资和高贸易顺差，但消费却长期低迷。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壮大，中美结构性的反差与不平衡（美国过度消费，中国消费不足）变得更加醒目，引发了美国对华战略的重大调整。美国为了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供给，减少了来自中国的进口，这客观上要求中国企业转型并开拓“一带一路”市场。在另一方面，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施加的限制，在短期为我们的产业链带来压力，但在长期却促成了本土企业构建自主供应链及提升内销产品质量。因此，这场中美博弈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告别单纯追求 GDP 数量的时代，步入一个更关注民生福祉、供给质量、和国家竞争力的时代。追求新质生产力与民富国强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特征。

## 破局之道： 现代金融市场——来自美国的启示



美国的高消费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因素推动：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市场体系塑造了美国重视收入及财富积累的本土文化；美国的战后的世界霸权地位导致其政府与家庭过度自信与过度消费；为维护霸权地位，美国不得不在全球驻军并形成巨大的政府赤字与债务；为维持高负债及美元霸权，美国不得不在金融市场过度创新，包括最近推出的美元稳定币与加密资产。而在这四个因素中，肖耿教授强调金融市场发展，也就是金融强国，对实体经济、国家竞争力、及国家安全的影响非常关键。

展望未来，中国拥有了发展金融强国的客观条件。在全球范围内，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人民币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因为有人民币就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及中国的股票与债券等金融产品，这个与二战后有美元就可以买到“美国制造”与美股美债类似。美元霸权及美国金融市场发达背后的核心就是用美元可以买到美国主导的供应链体系下的制造品、大宗商品、及金融产品。发展现代金融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第一，健康的现代金融体系可以降低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影响，确保金融安全。第二，金融是提振消费和创造财富的重要手段，包括推动高质量投资，并将产业发展的红利转化为财富的创造、积累、与传承。第三，现代金融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管理系统，对科创企业至关重要。好的金融市场不是消灭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市场，现代金融市场建设的目标是要将金融风险管控在合理的范围内，目标是服务实体经济，例如鼓励技术创新及实现民富国强。

美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核心优势之一，在于其高度发达且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这套体系像一台复杂高效的“风险转换器”与“创新孵化器”，将实体经济中创新创业所蕴含的巨大不确定性，分散给了全球范围内愿意且有能力承担风险的投资者。即使大部分初创企业最终未能成功，但它们所凝聚孵化的人才团队、技术创新和管理经验，会沉淀积累成为整个社会创新生态中的宝贵资源。另一方面，少数成功企业的巨大市值增长，通过“财富效应”会显著拉动消费与投资，实际上巩固了美元及美国金融市场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迅速，更擅长于通过银行信贷，支持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制造业扩张，为打造“世界工厂”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当经济转向更多依靠消费驱动和科技创新时，这套体系的风险管理功能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坚定而审慎地推进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改革，特别是能够更好管理吸收风险的股票及股权投资市场。中国需要构建一个法治健全、透明开放、能有效进行资源配置、风险定价与管理的现代金融体系，目的是将中国强大的实体经济优势更顺畅地转化为科技创新及民富国强的动力，增强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韧性。

## 中国与世界： 国际体系的变革与中国贡献



在肖教授看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一场静水深流式的重塑。二战后形成的、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刻演变。美国在其202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势均力敌的对手关系”，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跃升。

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在海外市场的发展，大大加强了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出口不断上升。如今，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领域处于主导及领先地位。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迫切需求来看，世界需要中国提供的绿色、高效产能。“产能过剩”之争往往是从中国国内需求这个局部和短期视角出发的观察。当然，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互动也面临新的问题：我们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与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定价与配置能力并不匹配。中国拥有高额储蓄，但在国内市场寻觅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变得更具挑战。

这一矛盾催生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从过去以出口商品为主，转向越来越多的直接投资和产能合作。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正与当地的人力资源、市场空间相结合，帮助其推进其本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种模式的深层逻辑，是将中国自身“通过开放融入全球分工从而实现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分享，其目标是培育当地市场，提升当地居民收入，最

终形成“投资-发展-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

未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更加复杂多元。中国的目标并非简单的替代或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是与各国共同努力，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探寻一条更包容、更韧性和更可持续性的共同发展之路。

## 政府何为： “复杂开放大系统”的阐释



肖教授受钱学森先生提出的复杂开放大系统影响，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分析现实世界治理模式的框架。其核心是将政府和市场看作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这与将两者视为对立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传统学界一直在争究竟是“小政府、大市场”好，还是“大政府、小市场”好，认为政府和市场是相互挤占的。

而肖教授在深入参与社会实践中提出了政府与市场本质上是互补的分析框架。他深入参与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研究，也曾经对广东佛山这座城市展开深入调研，并著书立论。他提出，政府作为产权制定者、市场监管者和纠纷解决者，承担了重大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责任，并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中国政府职能经历了从侧重直接配置资源、引导特定产业发展的“生产者”角色，转向更侧重于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和宏观政策来管理社会风险、激励创新行为、守护国民财富的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角色。政府的核心任务，是像园丁培育生态系统一样，专注于改良制度土壤、修剪风险枝杈、防范外部冲击，从而为市场中无数企业和个体的自发探索、良性竞争与茁壮成长，提供稳定、透明且可预期的宏观环境。

## 路在何方： 人工智能浪潮下，学者的实践路径 与青年的行动指南



人工智能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热的概念，和最大的焦虑。肖教授对此抱有十分乐

观的看法。尽管在短时间内人工智能会挤占掉一些岗位，但其还会制造更多更新的岗位。他还乐观的畅想，假如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的提升达到惊人的地步，就可以有效解决民众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供应，未来的年青人就可以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去最求理想，特别是在人文、艺术、体育、社会科学、及公共政策领域将有无限创新机会与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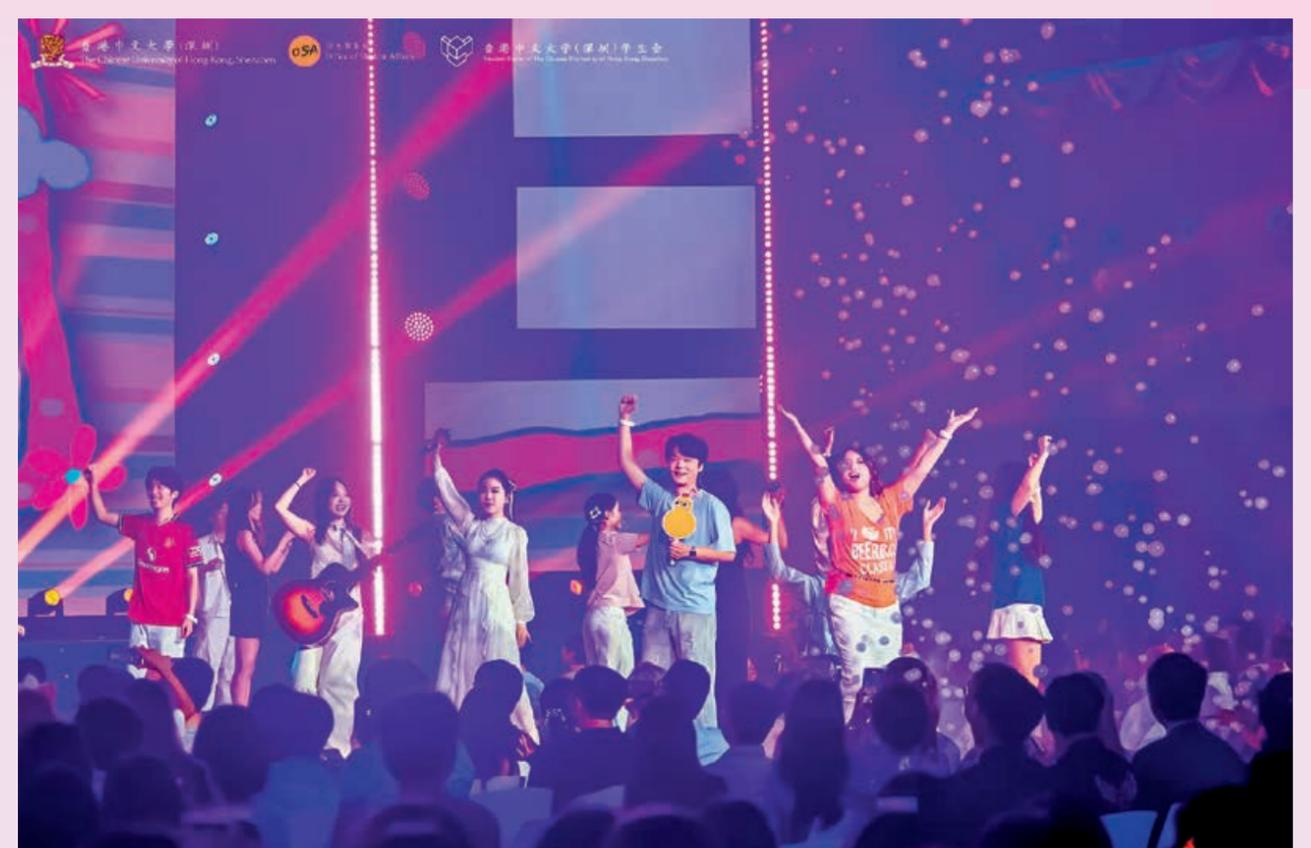
他还宽慰目前在焦虑中的年轻人，要拥抱变化，保持旺盛的好奇心与开放心态，将技术变革视为拓展人类可能性的工具，而不是仅仅看到短期对就业的威胁。其次，是学会在真实发现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并培养坚韧、乐观、共情的心理品格和价值观，因为未来社会可能更需要那些能够为社区、国家和世界做出贡献的个体。对于实在想要更具体建议的青年，他推荐可以多学习社会科学，因为很多社会问题将长期存在，是短时间内靠人工智能完全解决的。

由肖耿教授担任副院长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打破学科壁垒和校园与社会的围墙。通过构建学术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共同体，让学生和教师直面国际地缘政治、大湾区融合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政策、城市治理创新等鲜活课题。学者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带领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理论、培养能力的引导者。在经济充满活力，创新日新月异的粤港澳大湾区，可能上午的新闻热点，下午学院老师已经在与学生展开热烈讨论。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服务国家发展的氛围将帮助同学更快认识及融入日益复杂的现实世界。

正如肖耿教授所说，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小世界”，而公共政策学院就是依托着这个“小世界”来看大世界，不仅可以及时开展最前沿与最现实的理论研究，也同时解决那些最新也是最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

**Live in CUHKS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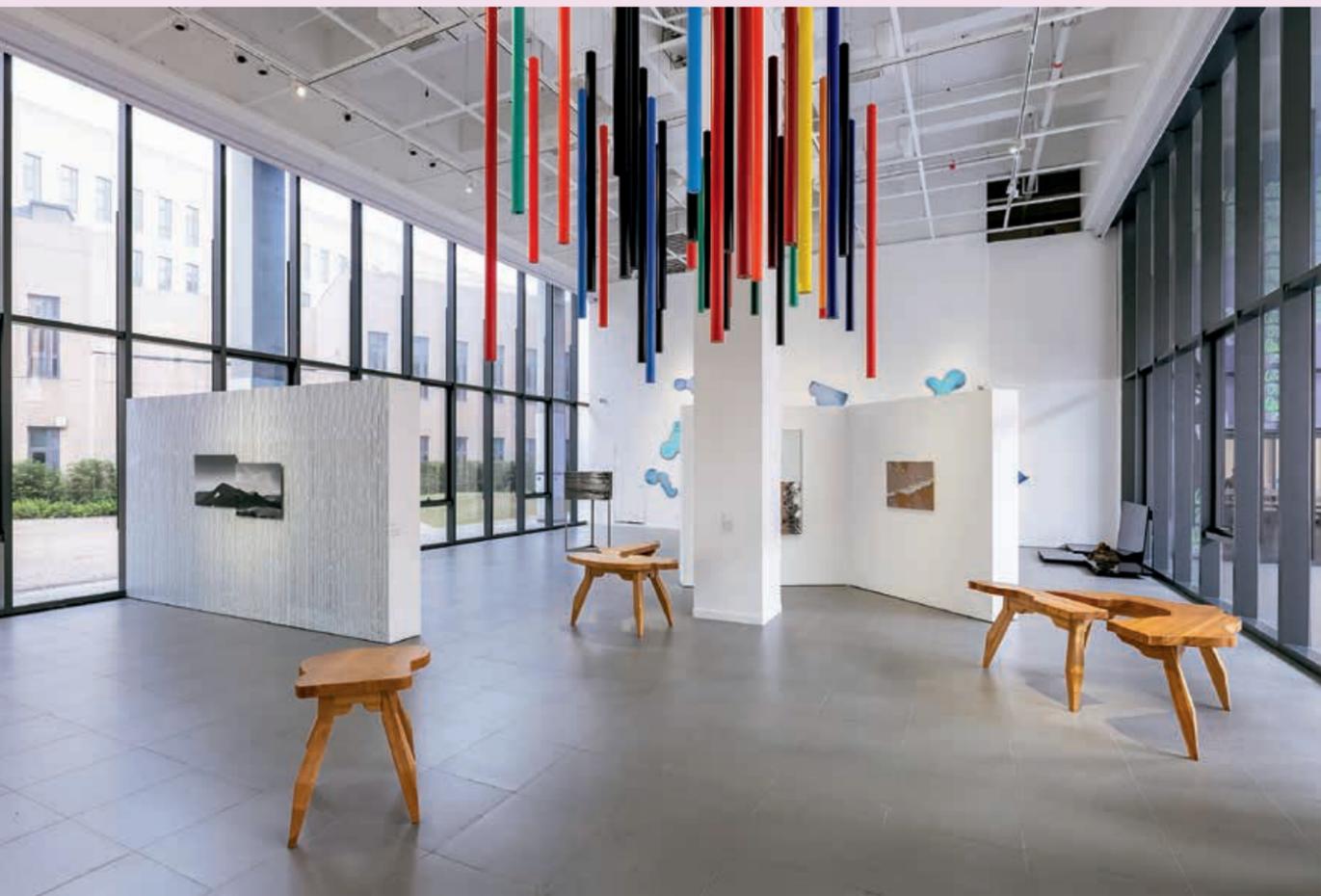








↑ 大学音乐会



↑ 艺术展览



↑ 国际合作伙伴日



↑ 迎新



↑ 校友返校日



↑ 全运会志愿者



# 2025 燃点音乐节





↑ 书院高桌晚宴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第十屆研究生畢業典禮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The Tenth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2025.11.16



声明：

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2026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6 年 3 月深圳第 1 版  
March 2026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200mm × 285mm  
Format 200mm × 285mm